

话说中国

# 百年记忆

卷十二

主 编 李 诚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中日联合公报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	(1)
毛泽东晚年划分“三个世界” .....	(12)
中苏大论战和中共“九评”裂痕 .....	(26)
毛泽东想向苏共说什么 .....	(26)
大论战 .....	(52)
与苏联决裂 .....	(58)
多事之秋的 1956 年 .....	(58)
第二次出访莫斯科 .....	(63)
西藏平叛纪实 .....	(74)
达赖和班禅尽释前嫌 .....	(74)
阿沛·阿旺晋美成为西藏解放的和平使者 .....	(81)
班禅大师还未进藏,他就愤怒地说, “这个脓疱总有一天要破的。” .....	(85)
班禅不幸而言中:骚乱一步步升级 .....	(87)
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	(96)
毛泽东巡视南方 .....	(114)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	(119)
初次接触高层的斗争 .....	(133)

庐山的较量 .....	(141)
山雨欲来 .....	(150)
“九·一三”事件 .....	(160)
清查林彪罪行 .....	(169)
“九·一三事件”的处理经过 .....	(178)

# 中日联合公报 和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9日是中日建交的日子。以后，我常想起当年周总理引用的一句中国古语：“饮水不忘掘井人。”他是教诲我们不要忘记为中日建交作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其实为中日建交付出心血最多的是我们的周总理，他是中日友好之桥的奠基人。

1971年9月13日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后，“文化大革命”出现转机，国内形势发生一系列变化。与此同时在外交战线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华。毛主席会见了尼克松，周总理同尼克松进行会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国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在联合公报的声明中，表明它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周总理一直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

常化。

尼克松访华，在国际上被称为尼克松冲击波，日本首当其冲。

台湾问题一直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也是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被美国占领，完全听命于美国，敌视、封锁新中国的旨意。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急需扶植日本作为远东的反共基地，十分担心在与日本签订和约之后，日本为贸易和其他经济的利益而同中国改善关系，动摇美国的对华政策。当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媾和独立后的日本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究竟选择哪一方为建交的对象，便成为美国特别关心的重大的问题，因此，日本才决定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和约和其他条约之前，向美方表示：日本只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这就是我在 1951 年底给杜勒斯特使写信的原因。”

所以，1952 年 4 月 28 日美国单方面和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的同一天，日本同台湾签订了和平条约。在条约中台湾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这就是所谓的《日华（台湾）和平条约》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这一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早在 1954 年周总理就指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在中国方面，旧金山条约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说台湾代表中国。中国人很伤心。”

1956 年周总理向日本朋友指出：“日本政府在中日建交上有困难，困难不仅在内部，而且更大的困难是由于外来的干涉和压力。”这个外来的干涉和压力就是来自美国。美国和

日本在 1951 年 9 月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条约允许美军无限期、无限制地驻扎日本。

可是这次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却将日本撇在一边，使佐藤内阁十分尴尬。

尼克松访华后，在日本要求与中国建交的舆论占了上风，给佐藤内阁造成很大的压力。

从建国初周总理就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他提出“以民间促官方”的方针；1957 年之后针对岸信介、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提出“政治三原则”、“经济三原则”、“中日复交三原则”。周总理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到 1972 年夏水到渠成、中日建交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了。

周总理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一般多是由廖承志同志协助。我作为外交部长参与了中日建交谈判的全过程，现仅就这段历史回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大家都知道，虽然 1972 年全国开始批判林彪集团，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左”的思潮并未能得到认真的清查。周总理一方面要协助毛主席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另一方面还要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同时要教育、说服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同志。不少同志对于打开中美、中日关系的重大意义不理解，特别不理解为什么要同“右派”打交道。所以毛主席在会见尼克松时说：“我喜欢右派。”尼克松则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毛主席的部署，周总理对毛主席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1972 年 8 月，他在接见一个兄弟党

的领导人时说：

（一）我们外交行动的方针是争取当权派，可以跟他来往，因为如果我们跟一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没有来往，我们就无法接近群众。跟上层来往就要跟他的当权派来往，而且要跟当权派的头子来往，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上层和人民有矛盾，上层的外交来往总还要保持一定的外交关系吧，跟人民的来往是民间的来往，我们倾向于把两条路线不要搞得太密切了，要分开一点，外交归外交，民间来往归民间来往。

（二）上层来往还是按原则办事，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必须要有原则性，才能允许可能范围的灵活性。

（三）根据我们搞上层统一战线几十年的历史得出两条经验：第一，当我们跟资产阶级决裂的时候，容易犯‘左’倾错误，把它看成铁板一块，只有斗争，反对一切，没有联合；第二，当我们跟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只有联合，没有斗争。

限于当时的情况，总理没有讲明，但是我们都知道，在1972年，“左”的倾向很有市场。总理讲这些话是用心良苦，他深知中日建交的时机就国内外来讲条件都已成熟，必须抓紧，否则一纵即失，不知要推迟到何时。所以总理对这项工作抓得非常紧。当时一些日本在野党希望由他们联合组阁来和中国建交。周总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美国都没有革命形势。他说：如果等到日本的左派执政再恢复中日邦交，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呀，这样中国就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建交了，只能限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建交，这不是把自

己孤立起来了吗？他也反对同一向敌视中国的佐藤内阁建交，而主张和自民党中主张中日友好的一派谈判建交。

7月7日，田中当选为首相，马上宣布：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7月9日，主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说：“田中内阁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这是值得欢迎的”7个字，字字千钧，一下子使中日关系明朗化。中国反应之快，大大出乎日本的预料，给田中内阁极大的鼓舞。

7月12日；周总理授权我发表声明：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来中国访问，会谈并解决中日邦交问题。进一步坚定了日中访华的决心。

与此同时，周总理事事向毛主席报告，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使“四人帮”无隙可乘。为使工作万无一失，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74岁的高龄，并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总理的精神感人至深，总理的举止言谈。音容笑貌至今仍历历在目。

由于政策明确，方法得当，从7月7日起只用了33天的时间就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中日之间不正常状

态结束。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不仅大大出乎美苏的意料，而且为世界各国观察家叹为观止。周总理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办事缜密周到，无可挑剔，令人折服。

为了使全国人民理解毛主席打开中日关系大门的意义，周总理从9月1日起修改《外交部关于接待田中首相访华宣传提纲》，并于9月4日亲自批发这个文件，要求各大城市“在9月20日做到家喻户晓”。经政治局讨论后，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个文件针对极“左”思潮回答了、解决了人民中存在的疑问。对于统一全党、全国思想和拨乱反正起到很好的作用，使“四人帮”不能有所作为。

9月25日上午11时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到达北京机场，受到周总理的欢迎。下午1点50分周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举行第一次会谈。田中首相和总理都没有休息。总理为人周到礼貌，首先问候首相：“你也没得休息一下，吃了饭就来了。”田中谈到中午的茅台酒很好喝。总理说：茅台酒比“伏特加”好，不上头，疲劳的时候喝一点能起振奋作用。你觉得好喝我们送一点给你，把你的“威士忌”改成茅台。大家都知道伏特加是苏联产的酒，威士忌是美国产的酒，总理的话一下子把大家说笑了。会谈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进行。这是周总理一贯的作风，首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周总理回忆了田中执政40多天以来的情况，他说：“首相阁下在外交上以这样高速度地进行，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很欣赏首相阁下9月21日宣布访华日期时跟记者所讲的，一定要使会谈取得成功，而且肯定会取得成功。

我们以这样的心情欢迎首相阁下来访问。”

田中首相表示了对周总理的敬意，他说：尽管从我的愿望来讲，希望加紧实现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时机不成熟，这种愿望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但周总理马上对我这个愿望表示了欢迎，并邀请我到中国来访问。也就是说，周总理马上抓住了这个时机，配合了我的愿望，做出了表示，所以我们才能迎接这个日子。我原来心里想，到中国来访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今天我能这么快到中国来访问，感到喜出望外。

随后，进行小范围（限制性）会谈。田中首相提出希望29日发表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用在日本国会通过。首相十分坦率，一下子就涉及核心问题。他和大平外相提出台湾问题和第三国问题。他说：我们要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只有自动取消和台湾的关系。可是一定要避免混乱。因为日本国会批准过日华（台）条约。

关于第三国的关系，大平外相说：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紧密的关系，日美关系对日本具有重大意义。日本政府要注意，不能从日本政府方面损害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要在此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周总理已身患绝症，在会谈中不得不出去服药，休息片刻。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说：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不提它，因为这是你们的事。

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表示：日中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然失效了。他指出：我们希望从政治上来解决一些历

史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日蒋的外交关系不能保存，但日本在台湾的侨民可以找到一个办法。

关于宣告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不同意日方的说法“确认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周总理说这样写，会变成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到现在这段时期，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我们又不是当事者，不包括在内。总理提议由两国的外长找出一个办法，即双方都同意的一句话。

总理坚持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要我和大平考虑每一项原则如何在联合声明中表达出来的问题。最后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就结束了，但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中日还没有建交，这在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不顺畅的，我们这一次要使他们在感情上顺畅起来，推动中日友好。

当晚，周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提出“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对日本侵华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谈判原则。他最后提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可是，田中的讲话引起了波澜。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周总理和我们在座的中国同志对“添了麻烦”这句话十分反感，会场气氛一下子由热烈变得冷清。

第二天上午，我和大平外相会谈，具体地讨论联合公报的内容。日方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首先发言：第一、不同意我方方案“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认为这样日华条约从一开始就是

无效的。第二、对我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他认为应分开写，第三条“日华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第三、关于台湾问题，他认为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已无必要对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认定。第四、关于赔偿问题，他说我们对于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放弃赔偿要求，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但认为蒋介石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如果现在声明上的文字表达上出现明确，意味着“日本和台湾缔结和约从一开始就无效”，日方则不赞成。

高岛发言的中心是台湾问题，他只拘泥于法律条文，他的发言给中日谈判带来了阴影。

当天下午，周总理和田中举行第二次会谈。日方有大平、二阶堂、桥本总参加。中方有我、廖承志、韩念龙参加。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周总理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的损害，而侵略战争的结果，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中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周总理直率地说，田中首相表示对过去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麻烦”。这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含意不一样。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了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如果你们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你们的习惯改。

道歉的问题解决了。

总理说：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

关于赔偿问题，周总理批驳高岛的说法：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周总理的谈话入情入理，明白简要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日本首相表示：完全明白了。

下午5点多，我和大平外相就条文的具体内容进行磋商。我方提出的方案，在前言中写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中日

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写日本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而回避出现《日台条约》。双方议定在声明中宣布今后中日完全存在和平关系，不明确说战争状态何时结束。这两个问题一解决，其他技术性的问题就好办了。中方指定由张香山带几个同志，日方由吉田等参加具体协商。问题解决之后，9月27日毛主席会见了田中首相。29日顺利地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中日联合公报。中日关系揭开新的篇章。周总理协助毛主席在70年代初打开了中日、中美关系的大门，为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准备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 毛泽东晚年划分“三个世界”

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国主宰世界的理论，一类是代表大多数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前者以威尔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所奉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后者则以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代表。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经历了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从1946年算起，到1974年止，历时28年。这28年是大量位于中间地带的国家发展壮大、民族意识崛起、维护自身利益、同大国强权政治抗争的过程，更是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露的过程。

通观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无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还是雅尔塔体系，都受到过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首先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侵略势力。同时，这个体系所代表的强权政治，也受到中国、朝鲜、印度、土耳其、埃及等亚非国家的反抗。耐人寻味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国家同美、英、苏等大国结成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轴心国的侵略战争。而战争的结果，不仅巩固了美、

英、苏等国的大国地位，这些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这就为二十世纪后中期逐步出现的多极化趋势，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局势又对雅尔塔体系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和冲击。

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苏美两极格局。而在世界出现两极格局的同时，多极化的趋势就作为一种潜流存在着。这首先是战后通过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产生的新兴独立国家，其中的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中国。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另一个世界两极格局形成挑战的是两大阵营中的离心和分化倾向。它始于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国从苏联阵营中分化出来，独树一帜；二是法国等欧洲国家同美国闹独立性。到 70 年代，又出现了所谓五强格局和美、中、苏战略大三角的态势。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后世界在以两极格局为主导的同时，世界多极化趋势孕育、发展并逐步突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呼唤着代表弱国、穷国、小国利益并反映多极化趋势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毛泽东始终对世界上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抱以同情和关注，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处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两者密不可分，利益息息相关。正是在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关于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形成

“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成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起了至关重要的铺垫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里，对战后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趋势发表了见解。提出：“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他认为，未来世界的发展尽管有曲折，但是“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方向不是由少数大国决定的，而是由各国人民来决定，他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些论断，和当时斯大林试图通过苏美两大国的妥协维持战后国际和平的构想有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估计战后世界局势的基本论点。

二战刚刚结束，在中国迅速形成了苏美等大国插手中国事务的复杂局面。而且，无论美苏都把各自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国民党政府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利用美英苏等大国均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有利情况，利用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争取胜利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的方针。他估计，在二战结束后维持一个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

1946年4月，毛泽东在国内短暂的和平局面即将被国民党打破的关键时刻，针对党内对于国际局势的一种悲观估计，

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关于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问题，毛泽东认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对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

关于两大阵营之间妥协的可能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妥协的范围，“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呢？毛泽东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是独立自主、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

这篇重要的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中间传阅过。直到194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才一致同意了这个文件，并向下传达。它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在内战爆发前后的整个历史时期对于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同时也反映出，在苏联斯大林多次向中共施加压力，要求对国民党实行重大妥协的情况下，毛泽东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了一条符合独立自主原则和实事求是原则的中国式的战略路

线。可以说，没有这样一条战略路线，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创建的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他对国际战略格局的不同看法，是在1946年8月，即中国内战正式爆发之后。这是对战后两极格局理论的挑战，也是对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奉行的妥协路线的挑战。不过，这篇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谈话，锋芒所向仍然是直指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

毛泽东在谈话中，科学地分析了战后国际格局，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他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中。”

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战略预见。对战后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冲击的，正是迅速崛起的广大中间地带。而美苏两国争夺的重点，也正是在包括欧洲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

50年代和60年代，中间地带理论一直是毛泽东视察分析国际问题、制定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同时，他又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及时补充发展了中间的地带理论，使之逐步得到检验和完善。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格局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的鼓舞下，亚非拉美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团结合作进一步增强，涌现出一大批新独立的中小国家。二是在两大阵营内部，都开始出现离心和分化的倾向。这两个趋势，尤其是第一个趋势，对于两极体系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同时也给被人为地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上述新的国际趋向，并着重从中间地带的内部分析方面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还认为，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和非洲。这里面很有文章可做。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

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美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积极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60年代，中苏论战后，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这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美国的裂痕也日益扩大，矛盾趋于表面化。这样，民族独立和两大阵营的分化三种力量汇为一体，对战后初期形成的两极格局，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冲击。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提出了存在着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重申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的论断。还说：“西德垄断资本想勾结美国又想抗拒美国，这点同日本相像。我们把这些地方都称做中间地带。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带。”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

随后，毛泽东在1964年1月5日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再次阐明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在同年7月的另一次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还明确表示：“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还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概念，来代表他所说的“中间地带”。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朋友。他在谈话中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排、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从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深刻地反映了战后世界格局在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反映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思考和完善的认识过程。它的问世，标志着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第一次有了真正代表它们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集中体现，也是国际社会逐渐进步的具体体现。

进入70年代，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

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著化。

首先中国战略地位明显提高。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的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同时拥有核技术和航天技术的亚洲大国，其战略地位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中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赢得了它们的信任，代表了它们的利益。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客观上形成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格局，中国的战略地位呈上升趋势，对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已成定局。

其次是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西欧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并在政治、防务等方面加强合作。日本终于成长为经济巨人，同时积极扩大在东南亚等地的政治、经济影响。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改变战略上的下降趋势，不得不对这些挑战持容忍和克制态度，并开始调整其亚洲政策和欧洲政策。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来自东欧。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状况。“布拉格之春”的出现和苏联侵捷事件的发生，清楚地表明东欧各国的改革对这些国家同苏联的离心倾向起到了何等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同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了来自东欧各国的不满和挑战。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冲击日益明显，国际

社会呼唤并孕育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间地带理论已不能适应这一要求，客观局势迫切需要从中发展出新的理论。

毛泽东在战后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虽然代表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发展趋向，但也不免受到原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和局限。一是这个理论还是以苏美两极对抗的大格局为前提的。不同的只是，它不承认这种格局为世界格局的唯一定势，并提醒人们对位于美苏两极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给予应有的关注。它在以一个旧的既成事实为前提的同时，又在竭尽全力呼唤着一个新的不断变化着的时代。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谈论中间地带时，中国却置身其外。这种状况是历史造成的，但也因此使中间地带理论受到各种制约。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最终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中间地带理论的超越和升华。而没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就没有从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超越和升华。

可以有把握地说，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了很久。但是，这个理论的正式提出，却是在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专门谈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更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

也是第三世界。”

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国际斗争的主题是反对霸权主义。他还郑重声明：“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对于这些提法，毛泽东明确表示赞同。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最主要的动因，是要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这方面，中国的确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是对剧烈变动、改组中的国际局势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没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没有对这种趋势的客观而深入的观察，要想比较全面地纠正极左思潮的影响，重新确定正确的处交方

针，并把中间地带理论发展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当然，同任何理论一样，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制约。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这个理论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产物，但也不能不受到在那个时代起支配作用的两极格局的影响，留有时代的局限和烙印。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无论在50年代还是在70年代，中国的外交指导都试图同其中的一方在战略上结成有形的或者无形的伙伴关系，争取形成针对另一方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同大国结盟思想的局限。其次，这个理论还受到冷战格局的影响，对爆发大规模世界特别是侵华战争的危险性估计日趋严重。毛泽东虽然正确地看到苏美两国争夺加剧、矛盾不可调和的一面，但对这种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的均势后互相牵制，爱好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力量也在迅速增长的一面估计不足。

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局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避免的。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力图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为中国争取一个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所作的不懈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中国就实现了从赢得国家独立到世界格局中取得重要战略地位的历史性飞跃。这种符合中国自身根本利益的战略地位，苏联不可能给，美国同样不可能给，只能靠中国自己独立自主地去争取。这是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取得的最大成就。

进入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

国的国际战略指导也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既是客观形势的变化造成的，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建国以来的中国外交指导进行认真反思的结果。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曾经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指导上的飞跃，概括为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險很迫近的看法，提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可能的结论。第二个转变，是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过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正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这些重大变化，根据新的国际形势，辩证地扬弃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的局限性和不足，使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了。在这二十多年里，世界格局继续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变化，并且必将对未来世纪初期的基本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演变过程，从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到这种格局与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及美、苏、中、德、日的五极格局同时并存，再到苏联解体后的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世界多级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世界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动荡、多变和过渡状态。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向我们不断揭示出这样一个真理：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由少数大国主宰世界各国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与大国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理论逐步走向衰亡的趋势相比，反映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弱国、穷国及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方兴未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作为以远见卓识反映和呼唤这一历史趋势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尽管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种种历史局限，但是它所揭示出来的时代规律和时代精神，却是永存的。

## 中苏大论战 和中共“九评”裂痕

中国革命曾经得到过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有力支持。但是，由于对中国具体情况的隔阂和大国、大党主义的影响，斯大林和苏共也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一些干扰和损失。对于这一点，中苏两党都心中有数。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也曾对自己的这些错误作过一些自我批评。

可以说，在中国党内，对于斯大林和苏共老子党、瞎指挥的作风，毛泽东的体会比谁都强烈。建国后，作为胜利了的中国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曾很想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作一深谈，倾诉内心的感受和积郁，但都未能如愿，1956年20大以后，虽然苏共人事已发生很大变化，但毛泽东的这种愿望却更强烈了。

### 毛泽东想向苏共说什么

1956年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八大结束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与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谈话中，毛泽东带着不满的口气说，对当年共产国际和苏共的

作法，我们是有一些意见的，过去我们不便讲，现在就要开始讲了，甚至还要骂人了。我们的嘴巴，你们是封不住的。

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党三次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接着，他说：

这些都是由于不相信自己，而一味盲听盲从盲动的结果。也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冲，出现的好似老子党与儿子党之分的不正常的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结果。不管口头上怎么称作兄弟党，事实上一个党竟可以凌驾于其他党之上，形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的局面，破坏了兄弟之间的正常关系。我发号施令，你得听话。服从，不管我说得对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要一个平等的兄弟党听从另一个兄弟党的话，服从另一个兄弟党的政策、策略和利益，跟着一个兄弟党的屁股后面跑的坏习气、坏传统，是一种极为严重的不正之风。试想，怎么可以根据一个党的具体条件、具体需要、具体利益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方针、政策、就是绝对正确的，而去要求处在另一种情况、环境条件下的党去听从，或照搬、硬套呢？怎么可以以一个党的利益替代另一个党的利益呢？客观实际、血的教训已证明这种做法是极端错误的，对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在批评了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以后，毛泽东又批评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他说：

我们党的幼稚、缺乏经验，主要表现为一些人的无知、愚钝和刚愎自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而只一味听从别人的、远处的、外来的、奇异的、不切实际而耸人听闻的东西。只要是外来的，不管正确与否，对我国革命有用与否，不分青红皂白，他们都一概当作圣物接受下来，照搬照套、照用、照

行，却不管其后果如何。但对这种盲从、盲目听信别人所造成的后果，却不能不说清楚，讲明白。不说清楚，不讲明白，怎么吸取经验和教训呢？盲目听信和服从别人，这确实是幼稚无知的表现。毛泽东指出，现在人们已开始懂得认真总结历史上的这些宝贵经验了。他说：

当我们党一旦克服了这些弱点，走上正确的康庄大道，就可以显示出不可限量的强大力量，这就是我国革命胜利，稳步前进的可靠保障，也是在实践中付出高昂代价而后获得的宝贵经验。但更可贵的是现在人们开始懂得了这点，重视了。这点。这真是用血汗换来的，用无数的牺牲换来的最宝贵、最值得珍惜的收获。固然，要革命就难免有牺牲。但是由于自己的愚蠢、无知和主观上的种种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即本来可以避免，而仅仅由于自己的疏忽、盲目轻信而使革命蒙受的重大牺牲，是最令人痛心的。我们今天活着的人，对牺牲在我们前头的人，心里感到特别沉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历史上的这些沉痛教训、曲折经历以及两党关系中这些不愉快的往事，使毛泽东心潮起伏。他再也难以压抑对苏联党和斯大林“老子党”、“瞎指挥”的愤懑之情：

关于这一切，我们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我是说，假如没有地方讲话，就写文章，假如憋不住了，就会骂人的。我们有这个民主权利，就要使用它，谁也封不住我们的嘴。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平则鸣”，我们要说话，要写

文章，也就是本着这个意思而来的。总之，气不平，理不顺，就要出气，就要讲道理。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以这样的方式一吐积郁，显然是受了苏共 20 大正式开始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国际共运内部思想解放兴起的影响。他希望通过历史经验的认真总结，进一步肃清大国大党主义在国际共运中的恶劣影响。然而，历史不久就证明，以批判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很快便又重新走上了大国沙文主义和个人崇拜的老路，并因此与中共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

毛泽东这次经过深思熟虑的谈话，不仅是对中苏两党关系的历史回顾，实际上也以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未来关系的轮廓。

1956 年 2 月，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赫鲁晓夫在会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和整个国际共运内部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实际上，对斯大林一些严重错误的批判，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毛泽东和中国党在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从原则上讲，中国共产党对批判斯大林的一些严重错误是赞成的。1956 年 4 月，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就又指出：“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同年 9 月邓小平在人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这样的方式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又感到某种不安和忧虑。

1958年3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

苏共20大之后两个月，毛泽东在他的那个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明确表达了自己成熟的意见。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毛泽东不能理解和容忍的是，作为曾经几次受到苏共和斯大林错误干扰和严重压力的中国共产党，都能够对斯大林做出“三七开”的客观评论，为什么苏联党内那些曾经把斯大林捧到天上去的人，现在竟这样对待斯大林！

在苏共20大之后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之后，严峻的现实证明了毛泽东

和中国党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时，毛泽东对苏共的做法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1956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表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1月30日，他在接见尤金时又表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除了斯大林问题，毛泽东对苏共20大另一个突出的不满之处，是苏共提出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来看，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正义战争制止了美国在亚洲东方所进行和所支持的非正义战争，遏制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头。与此同时，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所造成的紧张局势，由于苏联在欧洲主动作出的让步而趋于缓和。这种缓和局势在1955年7月间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日内瓦会议期间达到了高潮。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之后，在国际援和的声浪中，苏共20大提出并通过了通过议会道路由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

缓和也罢，和平过渡也罢，在历史的某些阶段，在某些特定的国家，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如果把他们作为唯一的选择，作为一种普遍规律，则不免失之片面。特别是，如果某大国大党在把它们作为一种唯一的选择以后又要别党别国都加以服从，则显然更是不妥的。不难想象，对于靠长期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对于建国之初就

受到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战争威胁，其神圣领土台湾还处于美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下的中国人民来说，对于面对着帝国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侵略扩张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来说，这一观点是很难被接受的。

由苏共 20 大所引发的在斯大林问题和和平过渡问题上的分歧，使毛泽东对苏共正在发生的变化产生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不祥的预感。

1956 年 11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在谈到苏共 20 大时，毛泽东表达了一种更深的忧虑。

关于苏 20 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了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否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如果可以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那么，列宁当年对帝

国主义的结论是不是过时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十月革命道路还有没有普遍意义？……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比斯大林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要不要坚持列宁主义的问题。

尽管如此，苏共 20 大在中苏两党间所造成的分歧，毕竟还处于一种初始阶段，带有一种局部的性质。苏共 20 大后，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而且面临着国际（如波匈事件）和国内（如 1957 年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等，许多重大难题，特别需要有崇高威望和影响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力支持，因而对中共意见、批评采取了尊重、虚心的态度。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帮助苏共领导渡过难关，对苏共的某些观点采取了不公开争论或互相妥协的态度。一方面在内部批评了他们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又对他们处理国际、国内一些问题的立场予以支持。

苏共 20 大引起的风波暂时过去了。但这次风波在毛泽东内心深处造成的震荡却无法平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去世后出现赫鲁晓夫，已经成为毛泽东内心中难以抹去的阴影。几年之后，这个问题甚至成为他考虑重大问题时的几个基本点之冲突。

1957 年 11 月 2 日到对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1957 年五月 14 日至 16 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11 月 16 日至 19 日，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举行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这次国际共运史上空前的

盛会，加强了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会议期间，虽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的战略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出于维护团结的共同愿望，两党在各自作了一些妥协、让步之后，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通过。

毛泽东显然是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成就和国际共运的空前团结所鼓舞。会议期间，他曾热情而又自信地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其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热切地希望，在这样一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在国内也取得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伟大胜利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也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高潮。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在莫斯科修改审定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社论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要求“把1958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

但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兴奋情绪，不久就又被赫鲁晓夫的无理举措所激起的愤怒所取代。

莫斯科会议的举行不仅表明国际共运经受住了反共浪潮的冲击，也表明了苏共领导已经渡过了困难阶段。赫鲁晓夫在克服了内外危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那些曾经在斯大林身上发生过作用的规律，又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了。他曾经严厉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他却又开始欣赏甚至鼓励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批判

过斯大林的大国主义，但稍一站稳脚跟，便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他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进一步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而当时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中国在外交军事上受制于苏联。

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0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在中国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设这两座中心所需要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等等。在中国领土上合资共建军事通讯设施，资金、技术大部分来自苏联，这就很敏感地涉及到长波电台将归谁所有、由谁控制的问题。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党和政府，对此不能不慎重考虑，严肃对待。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应由中国全部承担，建成后可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但是，苏方对中方要求拥有电台的全部所有权这一原则立场不予重视。苏方于7月11日向中方提出协议草案中，仍坚持由中苏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实际上还是要求把电台作为中苏两国所共有。中方不能接受苏方的协议草案。在中方提出的修改意见中，明确建议电台中方负责建设，主权是中国的，使技术协定的性质变为由中国建设和管理，苏联实际上只是提供某些援助的一项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

就在中苏在共建“长波电台”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过程中，苏联又向中国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1958年6月28日，根据苏方建议，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中国海军建设方面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尤金大使于7月21日求见毛泽东，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它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舰队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因此希望同中国商议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

苏方的这两个建议，使毛泽东感到突然和愤怒。赫鲁晓夫不能理解，对于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辟脱经过长期流血斗争才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对于一个把国家独立、民族尊严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的民族来说，对于一个有着长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传统，并曾与大国沙文主义进行过坚决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敏感并必然导致强烈反应的问题。

就在7月21日尤金大使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建议后，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毛泽东从苏方建议中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影子，而这却是来自刚刚倚重中国党的支持渡过危机、靠大批斯大林起家的赫鲁晓夫那里。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第二天，7月22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继续同尤金谈话。谈话中，他明确地告诉苏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建造新型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他气愤地说：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军队也可以到苏联

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界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你们可以说我们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讲，我也可以讲，你们要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中国海岸。

最后，毛泽东要求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不要粉饰。

尤金的报告使赫鲁晓夫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个粗鲁、轻率的政治家开始领悟到国家主权在毛泽东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到北京，就上述两项建议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解释。他推托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共同投资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这是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自己提出的。至于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一事，赫鲁晓夫把它说成是因为尤金大使传达错了而造成的误会。

会议中，毛泽东很清楚地把问题的性质提到赫鲁晓夫面前：

我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

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

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不干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

第三，撤回我们的请求，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

第四，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

第五……

等等

毛泽东的谈话，使赫鲁晓夫看到了中国领导人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决态度。他一改初衷，同意由中国自己搞，苏联可以贷款帮助建设，所有权是中国的。8月3日，两国国防部长签署了协定和有关订购设备及聘请专家的合同。后因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合同，由中国自己完成了长波电台的建设。

在这次中苏最高级会谈中，苏联领导人放弃了他们原先的建议，但却无法弥补这次争执在两党之间所造成的裂痕。毛泽东加深了他对赫鲁晓夫的不信任感。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由“长波电台”、“共同舰队”引起的涉及国家主权的冲突刚刚过去，1959年，中苏关系又因苏联领导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而风波再起。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并发表了会议公报。这个后来被赫鲁晓夫苏联舆论界吹捧为“历史的转折点”，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的“戴维营精神”，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热衷于与美国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

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在如何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由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继续对中国采取封锁的亚洲冷战体制，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维护中国的

国家安全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而苏联领导人为推行其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不顾美国到处干涉与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事实，也不顾其他国家对美关系的不同具体情况，硬要其他国家共产党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来处理对美关系，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不和避免地进一步扩大、加深了。

当时，对于苏联提出的一些有益于缓和国际局势的主张，中国是支持的，赫鲁晓夫访美之前，毛泽东还写信祝他此行“在争取和缓国际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后，1960年初，毛泽东在批评访美为美帝国主义擦粉的同时，也曾指出，赫鲁晓夫访美，开高级会议是做了很好的事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不能同意的，是苏联领导人粉饰美帝国主义种种倒行逆施，以及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主张。

问题还在于，赫鲁晓夫访美前后，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力图使中国的外交服从于苏联的全球战略。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严惩蒋介石集团的挑衅行为，打破了美国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事先，中国曾把即将采取的行动向苏联作了通报。赫鲁晓夫虽然声明支持中国在海峡同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但又深恐此举会影响美苏合作的气氛，甚至可能导致美苏冲突。9月初，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秘密访华。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告诉他：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只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在得到了

这样的保证之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警告说，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而事实上，赫鲁晓夫一直对炮击金门、马祖妨碍了美苏合作的气氛而耿耿于怀。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担心西方国家因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为由，提出中断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从而单方面地撕毁了1957年10月双方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境发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担心这一事件会给他的访美之行带来不利影响，因而不顾中方的多次解释和劝阻，迫不急待地就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和偏袒印度、公开暴露中苏分歧的塔斯社声明，是赫鲁晓夫追求实现美苏合作，为即将举行的美苏会谈向美国献上的两份见面礼，是他以突出中苏分歧来取信。取悦于美国的拙劣之举。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又赶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9月30日的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吹捧“戴维营精神”，宣传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并用教师爷的口吻，教训中国不要希望“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10月2日，赫鲁晓夫等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长

达7小时的会谈。会谈中，他的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他不但埋怨中国1958年炮击金、马给苏联“造成了困难”，而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示不满。他提出，“美国宣布支持蒋介石，我们宣布支持你们，这样就造成了大战前夕的气氛”。他希望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等等。在谈及中印边境冲突时，他继续采取偏袒印度的立场。

赫鲁晓夫显然还沉浸在刚刚结束的戴维营会议给他带来的巨大兴奋和优越感之中，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美苏合作的意义，以此为出发点对中国党的内外方针指手划脚、评头品足，要求或者暗示中国牺牲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去实现苏联的外交利益，甚至发泄以往中国领导人对他们批评的不满。

毛泽东抽着烟，静静地听着。他望着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回想着自苏共20大以来两党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在斯大林问题上分歧，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我党“双百方针”的批评，对“大跃进”的嘲讽，在台湾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的不公正立场，在长波电台、共同舰队上的无理要求，撕毁中苏新技术协定，以及在戴维营会谈后要求中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苏联的全球战略……。毛泽东感到，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正在迅速扩大。他已经预感到今后国际共运中将会出现更多的曲折和风浪。毛泽东讲话了。他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立场，断然拒绝了苏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建议，拒绝了苏方为取悦美国而希望中国立即释放5名美国特务的要求。他表示，将来可以放，现在不行。会谈在激烈的争论中不欢而散。

会后，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出于和解的愿望，一方面也是有感于苏方在一些问题上的鲁莽，曾提议将10月2日中苏会谈记录烧毁。这个鲁莽的政治家有时又幼稚得惊人：如果不放弃自己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立场，烧毁一纸记录又有什么用处？！

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回顾这次争论时，曾说：去年10月，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该拿武装去试验资产阶级政权是否稳固，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他采取中立，在国际共运史上，第二次共产党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自己兄弟。他还给我戴上了两顶帽子，说我是冒险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也还了他一顶帽子——迁就主义，半修正主义。他不骂修正主义，骂教条主义，所以跟他的指挥棒走很难。另一方面，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也提出，赫鲁晓夫是善变的，对他要再看几年，对苏共要照顾，估计他会变的。总的来说，应当估计苏联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他怕我们戴他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帽子。

自1960年起，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缓和的不多，冲突却一直在发展。较之50年代，双方分歧和争论的内容涉及到国际共运中一些更为广泛、深入的问题。1956年至1957年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反对个人崇拜和和平过渡两个问题上。1958年至1959年间，斗争主要涉及到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进入60年代后，双方的争论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更为严重的是，赫鲁晓夫凭借其大国大党地位，把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

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4月，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中国《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先后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等文章。这些文章针对赫鲁晓夫违背1957年《莫斯科宣言》、散布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鼓吹两大国主宰世界的言行，引证列宁的论断和1957年莫斯科宣言，一一进行了批判。文章就帝国主义本性是否改变、马列主义学说是否过时、现在究竟是什么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重大问题，阐述了中国党的立场和观点，批评了国际共运中其他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由于历史局限，这些文章在批判苏共大国沙文主义和对美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的同时，也表露出我党当时一些“左”的思想倾向。

在毛泽东看来，在与苏共的分歧中，除了对个人崇拜、大国沙文主义等老问题外，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和平过渡”这个根本问题上。而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用他的活来说，就是列宁主义还灵不灵？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60年代初，毛泽东发展了八大前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虽然还不能说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已经形成体系，但这一观点肯定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因为：

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不用暴力就可以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何处去了？只有“同一”，没有“对立”，“斗争”他不讲了。有些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思想相当混乱，《莫斯科宣言》丢到脑后去了。人们反对教条主义，把列宁主义的对立斗争和对立统一说成是

教条。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主义，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灵的，现代是不灵了。现代不灵了，阶级消灭了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还是资产阶级在一个晚上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了？因此就可以和平过渡了？因此战争的可能性可以连根铲除了？

在此之前，尽管存在着分歧，毛泽东和中国党仍然希望在两党内部，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这些分歧，而不主张把这些分歧公之于众，特别是暴露在帝国主义面前，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但是，在苏共在中印边境冲突时用发表声明的办法把两党分歧公诸于众之后，中国党开始在报刊上批评苏共的一些做法。即便如此，中国党仍然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应该通过内部的平等协商和同志式的讨论与争论，求得认识上的接近和一致。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耐心等待，让实践证明谁是谁非。

但是，中共的这些良好愿望并没有使赫鲁晓夫等稍有收敛。苏共在分裂、甚至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0年6月，在有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策划了对中共代表的围攻，搞突然袭击。当中国共产党表示她“宁可被碾得粉碎也决不屈服”之后，苏联又进一步在国家关系方面施加重大压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化国家关系的步骤。

1960年7月6日，即布加勒斯特会后第10天，苏联单方面决定停止中苏两国互惠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

7月16日，苏方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并撕毁

有关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是苏联领导人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

7、8月间，苏方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边境纠纷，如此等等。

苏共领导的一系列背信弃义行为，给当时正处于严重困难中的中国人民又增加了巨大的压力，但它却不可能使中国党和中国人民屈服。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严正指出：“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整个计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进行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

赫鲁晓夫又一次低估了中国党，低估了毛泽东。面对着苏方的施压、挑衅和刁难，中国党和毛泽东处变不惊，从容坚定，又做了一篇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大文章。早在1960年初，毛泽东在谈及当时世界上出现的一段反华逆流时曾说：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1960年初，苏方撕毁经济技术协议后，他们不会想到，毛泽东对这一背信弃义行为的回答是：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几年后，当中国已经战胜经济困难，突破了一些尖端技术时，毛泽东又以幽默的口吻说及此事：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毛泽东的坚定、从容、自信，来自他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对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信仰。和他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自如。1961年底，他有一段话：

我常说天是垮不下来的。马克思领导过巴黎公社，后来失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第一国际，后来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第二国际，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但第二国际后来也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的政党，那时，天好像要垮下来，但是，列宁同伯恩斯坦主义的坚决的斗争，打败了伯恩斯坦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建立了第三国际代替第二国际，并且在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的故乡苏联，出现了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苏共变为修正主义，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会垮下来呢？不会的！过去就没有垮过嘛！今后也不会有天垮下来的事情发生。现在时代和过去不同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苏共绝大多数党员和苏联人民也要革命，要社会主义……。

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赋予毛泽东一种巨大、深沉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使毛泽东几乎是本能地藐视苏共领导趁人之危给我们造成的种种困难。

1960年11月，第二次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中苏双方在相互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也作了一些妥协。在此基础上，会议一致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会议使中苏两党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毛泽东对这次会议的成果给

予了积极的评价。同时，他又指出苏共“病根未治”，估计到时还会有反复。

1961年10月，苏共22大举行。会议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重要观点，并再一次掀起了大反斯大林的浪潮。会议攻击了当时与我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公开号召推翻阿党领导人，在国际共运史上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攻击另一个党的先例。与此同时，会议还多处影射反华，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中共代表团长周恩来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做法，重申了中国党希望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愿望。

苏共22大加深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会后不久，苏联断绝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进一步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国党则发表了阿党反击苏联的材料，苏共对此进行指责，中苏关系再度恶化。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国党戴上了“反对列宁主义”，“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等帽子。1962年4、5月间，苏联在中国塔城和伊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制造了伊宁事件，引诱、胁迫6万余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

1962年8月，中印边境再次发生边境争端。苏联公然采取支持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立场，在外交上为尼赫鲁政府辩护，并从军事装备上给印度以支持。

随着赫鲁晓夫在大国主义、分裂、反华的道路越走越远，毛泽东对赫氏、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根据这些思考，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60年代初，毛泽东曾作出苏联主要领导人是“半修正主义”的结论。他认为赫鲁晓夫推行的政策代表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批变质的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考虑到赫鲁晓夫其人变化无常，他的一些主张也不算系统，毛泽东又表示，对他还要再看一看。

1961年9月，苏共22大前一个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问题是，赫鲁晓夫到底代表什么阶层？代表高薪阶层。赫鲁晓夫代表的阶层与帝国主义代表的阶层，实际上是相同的。高薪对低薪，明明是不人道，而反对他的人是低薪的普通工人、农民……。几个月后，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已经被修正主义篡夺了。根据对苏共领导不断加深的认识，毛泽东对国际共运的前途及我们党的对策也作了几种考虑。60年代初，他曾提出，解决分歧有两个或三个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经过比较短的时间就获得解决。第二种可能是，时间面要相当长，但不是很长。第三种可能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他又指出，我们要准备最坏的情况，准备他们采取1948年对待南斯拉夫的那一套办法，因为现在这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修正主义这种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它要泛滥一个时期。

在苏共领导的共运纲领中，毛泽东最不能同意的是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资产阶级手中的暴力工具，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使它和平地转入人民手中，改变它的性质。它不仅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

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实践。他认为，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不过渡。鼓吹和平过渡，就是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在武装到牙齿、在世界各国到处进行侵略、颠覆和干涉帝国主义面前放下武装，放弃暴力革命，这实际上是背叛革命，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苏两党的斗争是世界人民革命的问题。

对于苏共等早已酝酿、而在 22 大终于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毛泽东也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这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实践。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党是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既然是“全民”的，还要它们干什么？这是一个连形式逻辑都不顺的悖论。在政治上，它对社会主义各国，对全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危害极大。1963 年 5 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元世界、全民党、全民国家是一言丧邦。

尽管毛泽东已经明确了苏共领导的性质，并对赫鲁晓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仍然认为，不管人家怎样，我们对苏联要采取团结的方针，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团结。1963 年 9 月，他还重申了中央对苏联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

面对着日益加深的中苏分歧和国际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华浪潮，面对着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没有丝毫的沮丧与惊慌。他坚信他的理论和实践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坚信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反华不得人心，坚信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总是要革命的。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满怀信心

地说：

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会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他又说：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他坚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的经验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统治了，还要学习吗？我

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他表示：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

最后，毛泽东从容、坚定地说：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与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还孤立吗？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民还孤立吗？（笑声）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可能愤愤不平于自己当年在政治角逐中的毁灭，也可能是出于对当年论战中左支右推窘境的耿耿于怀，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罗列一大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材料”后，对毛泽东发了一通充满怨恨刻毒的议论。但是，如果他看过毛泽东当年这些文字和言论，那么，不管他曾有多深的成见，也不论毛泽东当年在理论上曾有一些错误，赫鲁晓夫都难

以否认，不论是在哲学素养、政治智慧和信仰力量方面，还是在从容镇静、挥洒自如的气质、风度方面，他们都不处于同一层次上。毛泽东的冷静、坚定、深刻、机智、从容、乐观与赫鲁晓夫的鲁莽、游移、轻率、偏狭、粗俗形成了鲜明对比。

## 大 论 战

1962 年底至 1963 年初，苏共及其影响、控制的一些欧洲共产党进一步对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党的攻击。我党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希望回到内部平等协商的轨道上，通过同志式的讨论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但分歧已发展至此，这些努力已无济于事。在这样的背景下，自 1962 年 12 月至 1963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 7 篇答辩文章。根据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这些文章留有余地，没有点苏共领导的名，对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有一些限制。

1963 年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对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总看法。同年 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并于 6 月 17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作为反对苏共

3月30日来信的答复。复信就诸如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概括、当前时代及其基本矛盾、怎样对待社会主义阵营、怎样认识帝国主义、怎样认识和对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反对个人崇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经过频繁磋商和尖锐的争论，中苏两党于1963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了高级会谈。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进行。会议进行期间，苏共中央违背双方达成的协议，破坏会议气氛，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和攻击。7月20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指出：《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并声明“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后，苏联又掀起了一次反华高潮。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文章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革命与建设中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这场空前规模的公开大论战，导致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党的分裂。

在这场论战中，中国党对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批评

反映了当时许多国家共产党的意愿，赢得了他们的尊重，捍卫了中国和中国党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斗争产生了深远的积极意义，这在东欧巨变和苏联瓦解之后，看得更为清楚。对于议论的这一方面，邓小平后来曾总结说：“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但是，在涉及国际共运的理论和战略策略等问题时，两党都有不少错误。对于争论的这一方面，小平后来也指出，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并不都是他们。

回顾这段历史，邓小平后来也有过一个总的看法：

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中苏分歧和论战不仅震动了世界，而且也多方面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

早在 1956 年苏共 20 大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就已浮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在错误地批判彭德怀时，就曾认为这股“右倾风”与国际上修正主义相呼应。

自 60 年代初起，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自己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也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六十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等国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1960 年下半年，毛泽东在论及当时农村整风整社的重要性时，就曾指出，不每年整风，将会出中国的赫鲁晓夫。1961 年初，他在说到莫斯科民国党的会议“病根本除”后，接着指出：病根在我们国内也有，不仅党外有阶级，我们党内组织也不纯，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所以，我们也应纯洁党的组织，办法就是整风和整顿组织。

经过不断的思索，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国内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基础在我们国内也存在。在他认定赫鲁晓夫的社会基础是苏联的高薪阶层后，对国内的高薪阶层、干部特权也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如果说以前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例外的话，那么，在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就不能这

么说了。他说，苏联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更多。所以更应提高警惕。

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泽东开始对“三股风”进行严厉批评时，曾尖锐地提出：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是走赫鲁晓夫道路，还是南斯拉夫道路？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

他还提到：

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不难想象，1961年11月苏共22大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加深了毛泽东的警惕。毛泽东正是用这种警惕的目光，反过来审视1962年上半年国内调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因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内形势的忧虑和不安。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又开始了把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自觉地联系在一起。所以，1963年2月，在说到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时，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国内的反修的任务时，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要结合我们自己国内的反修正主义，把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分子一齐扫一下。到1963年下半年。他的提法更明确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城市五反，实际上是为国内的反修打下基础，是反掉修正主义的基础。到1964年，他已经把“四清”中的那些

“典型”如天津小站、甘肃白银厂直接等同于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了。

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那些已经变修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归根到底，是党和政府的蜕变，是党、政、国营企业及其他部门中产生出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结果；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特权阶层的代表。这些新形式的概念和思路，马上又被用来分析国内的问题和形势。所以，“四清”运动中很快形成了“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等概念，得出了“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这样的结论。

中苏大论战加深了，加重了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这不仅仅是因为他认为存在着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者“相互呼应”的问题，更是因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与国内“修正主义”的分析框架之间的逐渐重合，以及由于“反修”。“防修”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有力的放大、催化作用。

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迅速发展，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机感、紧迫感的压力下，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 与苏联决裂

### 多事之秋的 1956 年

从 1956 年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续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使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开始面临一场真正的考验。1956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国方面派出了以朱德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会祝贺。不料，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事先没有同各兄弟党通报的情况下，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个报告不仅在苏共党内造成了思想混乱，引起了重大的分歧，而且在国际社会上也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中国共产党是有不同意见的。1956 年 4 月，毛泽东先后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话，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格“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1956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时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11 月 30 日，毛泽东再次接见尤金时又指出：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

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本着这样的精神，中国方面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无产阶级领袖和群众的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对斯大林的一生作了相对客观公允的评价，文章提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起到了澄清思想，稳定队伍的作用。

然而，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1956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先后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事件的发生，与苏联平时的大国主义错误和苏共二十大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思想混乱是有关系的。为了解救危机，中国方面派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共商讨解决办法。中国代表团在基本支持苏联解决问题方案的同时，亦指出了苏联的大国主义错误。苏共领导人采纳了中国方面的建议，于1956年10月30日由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宣言》，主动承担了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某些不适当的作法的责任，并且表示今后将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共同讨论一些措施，“以消除破坏国家主权、经济上的互利和平等这一原则的任何可能性”。

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政府的宣

言，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更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忽略平等原则，特别是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在这之后，中国、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多边会谈，从而稳定住了东欧局势，加强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团结。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事之秋，中国方面在处理中苏关系时既注意坚持原则，讲清楚自己的观点，又注意维护大局，给予苏联以必要的支持；而在苏联方面，由于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失误，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掀起了反共风潮，再加上波匈事件的发生，已经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迫切需要中国方面的支持，因而，赫鲁晓夫等人这时对中国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同时也注意与中国协调一致。

毛泽东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意见，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两篇重要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高度重视。1956年12月31日，在苏联政府举行的除夕宴会上，赫鲁晓夫对刘晓大使说：“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接着，他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其中对斯大林的评价已明显缓和，他说：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他

还就匈牙利事件说到：“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从而表现出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强硬态度。在这次宴会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大使刘晓格外关照，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与莫洛托夫之间就座。这一切显然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是团结一致的，帝国主义阵营企图在中苏之间寻找裂痕是徒劳的。

不过，中苏关系在经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些风风雨雨之后，要说一点也不受到影响，那也是不现实的。赫鲁晓夫的立场虽然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今后如何还是个未知数。对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中苏关系时指出：“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毛泽东又说：“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

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当然，这时中国方面对苏联的态度，还是立足于帮，立足于多作工作，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变化，而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的利益和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1957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正是由于中国方面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出发，确定了这样一个求同存异的基本方针，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不同凡响的第二次苏联之行。

## 第二次出访莫斯科

赫鲁晓夫早在 1954 年首次访华时，就曾提出过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1957 年 5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邀访华期间再一次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盛情难却，1957 年 11 月 2 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 40 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宋庆龄、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陆定一等重要领导同志。

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这次访问非常重视，作了精心的准备。虽然毛泽东事先请求苏方把机场的欢迎仪式统统取消，但苏联方面还是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迎宾仪式，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都到机场迎接。

毛泽东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说：“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欢迎仪式结束后，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前往下榻的克里姆林宫。

1957 年 11 月 6 日，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应邀参加了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

40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热情赞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他指出：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毛泽东又说：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40周年，因为这40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36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

关于中苏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条约。这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毛泽东的讲话受到在场的苏联听众及其各国代表团的热烈欢迎。

11月7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又出席了在红场举行的隆重的阅兵典礼，以及当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由伏罗希洛夫主席主持的盛大招待会，再次向苏联人民表示节日的祝

贺。

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结束后，在莫斯科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借此机会于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召开代表会议，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11月1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抗衡帝国主义侵略威胁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应“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指出：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

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毛泽东又说：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毛泽东认为，要想从根本上保障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必须要有实力，要“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而这首先得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而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这个问题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是有不同看法的，因此，毛泽东不仅在会上透彻地说明了以苏联为首，即“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而且在会下作了许多工作，使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苏共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中的某些错误作法也坦率地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毛泽东又说：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讨论，着急不行。赫鲁晓夫对这些忠告并没有完全接受，他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很生气。赫鲁晓夫还在毛泽东面前贬低斯大林，说什么：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这个人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妥善的作战方案，遭到拒绝等等，这表明赫鲁晓夫在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反省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错误作法，而且缺乏自知之明。

在会议期间，各国共产党代表团还就起草会议宣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同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进行了协商。其中争议最大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苏共在其提出的宣言草案中，只提和平过渡，不提非和平过渡，并且把和平过渡片面解释成“在议会中争取多数，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人民政权的工具。”对此，中共代表团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且提出了中方的修正草案，但为了照顾苏共领导提出的希望能够同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衔接的问题，中方也作了一定的让步。这样，中苏双方经过多次协商之后，形成了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又交各国共产党代表团讨论定稿。会议最终通过的宣言，

这一问题的表述上，有两点重要的变化：（1）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亦指出了非和平过渡道路；（2）在提到争取议会中稳定的多数的同时，亦强调展开议会外广泛的群众斗争，摧毁反动势力的反抗，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条件。这些修改，是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国家代表团共同努力的结果。11月16日，毛泽东会议上再次发言说：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

这次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共同协商基础上，通过的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具有重大的意义。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圆满结束的基础上，所有来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64个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又举行了会议，并通过了和平宣言。毛泽东在11月18日的会上，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团结问题，发表了即席讲话。

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提出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1. “东风压倒西风”。他说：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2. 要警惕“想发动战争的疯子”。毛泽东说：“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但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3. 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毛泽东重申了1946年他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的观点，他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4.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毛泽东讲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指“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要认真对待，不容轻率。毛泽东举例说：我们在战

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毛泽东的这番话充满了辩证法，使人们透过现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提高了人们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问题，毛泽东形象地说：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

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

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这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深入浅出，入情入理，对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过各代表团的共同努力，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开成了一次团结的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在访苏期间，毛泽东还与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胡乔木、陆定一等领导同志一起，到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代表。毛泽东在向留学生、实习生亲切问好之后，风趣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片笑声和鼓掌声。

毛泽东在苏联的访问活动也引起了苏联公众的浓厚兴趣，中国代表团陆续收到苏联公民们的大批信件和电报，有的还附来了珍贵的礼品。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充分表达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中国代表团和毛泽东的诚挚情谊和良好祝愿。对此，毛泽东深受感动，并于11月20日致信给苏联《真理报》编辑部，请《真理报》转达六亿中国人民、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衷心感谢。毛泽东写道：“我们把苏联人民的这种感情看作是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象征”。同日，苏联方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茶会，邀请各界人士与毛泽东见面，其中有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和他的弟弟米格飞机设计师阿尔疆等知名人士。毛泽东对这一活动非常高兴。当天晚上，苏共中央主席团又为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宴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等苏联党政军重要领导人都出席了宴会，热烈祝贺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成功。

平心而论，在访苏期间，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对苏联提出的和平过渡等问题是有看法的，对赫鲁晓夫的某些言论也是不满意的，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在国际上击退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各兄弟党之间的团结，中国方面还是注意维护苏共的威信的。而苏联方面这时处境困难，对于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还是很尊重的，接待规格也是很高的。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是相互通气的，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能够做到平等协

商，互谅互让，不使矛盾激化。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这次苏联之行，不仅圆满地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向苏联党和人民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发展了中苏关系，而且还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人一起，讨论了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斗争中的迫切问题。为改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因此，这是一次意义重大而又富于成果的外交活动。

## 西藏平叛纪实

在庐山会议之前，西藏爆发了一场叛乱事件，尽管事态很快平息下来，却对以后的外交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在叙述这次平叛斗争之前，我们不防先来回顾一下西藏和平解放的前前后后，以便于洞察西藏叛乱的真相。

### 达赖和班禅尽释前嫌

1950年，除西藏以外的中国大陆全境解放，西藏历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侵犯的一部分，共和国的领袖们自然也时时不忘祖国的统一大业。

海南岛、舟山群岛相继解放后，达赖喇嘛派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人来京，和中央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同时，刘邓大军下属的18军，取得昌都战役的胜利后，翻越雪山草地，大军挥师西进，直指拉萨。此时，18军军长张国华也回到北京，和西藏代表一起，协助毛主席一起商讨统一大业。

签订和平协议过程中，在中央的领导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阿沛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上签了字，班禅喇嘛对协议签

订起了积极的作用，表现出了很大的爱国热情。

达赖和班禅是西藏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地位完全平等，两人分管前藏和后藏。达赖驻地是布达拉宫，领导着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噶厦。班禅的驻地是后藏的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领导着堪布会议厅，也就是堪厅。由于堪布会议厅和春夏秋噶厦政府失和，九世班禅恐遭不测，便于1923年离开西藏，最后在青海塔尔寺仙逝。按照惯例，西藏噶厦政府、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和青海塔尔寺的班禅行辕均开始寻访九世班禅转世灵童。驻在青海塔尔寺的堪布会议厅经过一系列工作，确认青海灵童宫保慈丹是九世班禅转世，也就是这次来京的代表十世班禅。

但是噶厦政府拒绝承认十世班禅，十世班禅现在还只能住在青海香日德。另外现在十四世达赖还在亚东。这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应该积极促成他们的友好团结，并创造条件，让达赖、班禅回驻锡地，这也是西藏僧俗大众的热切愿望的一件大事。

毛泽东听完了去西藏谈判的中央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和18军领导人张国华、谭冠三的介绍后，确实感到此事重大，需慎重研究。

周恩来总理也是推动和平解放的领导者之一，他指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其中有条专门讲了达赖和班禅的关系，一条讲的是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一条讲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共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达赖喇嘛已于5月28日来电，同意这两条内容。现在达赖驻亚东，他和噶厦对中央尚有疑

虑，搞不好就可能出走国外。所以总理建议不要由中央出面直接派代表护送班禅回西藏，以免达赖起疑心，以为中央有意让班禅代替达赖，使他下决心流亡国外。

于是，中央委派张经武将军作为中央代表先经印度去西藏，张国华谭冠三率部队由昌都出发进藏。

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议，班禅大师前往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阿沛回西藏，中央代表张经武一行也正准备启程。

张经武将军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战士，湖南人，曾在红一方面军担任过教导师师长，解放战争中担任过解放军纵队司令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为解决西藏问题，毛泽东把他调出来担任中央政府代表。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后，张经武按照中央的决策带领18军联络部长乐于泓经印度去亚东，争取达赖回拉萨。

1951年6月30日，张经武一行离开北京，转道香港、新加坡、印度、锡金，于1951年7月14日到达西藏亚东。

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闻知中央代表到了，即派噶伦（即地方政府主要成员）然巴、索康、饶噶厦、洞波四人拜访中央代表。张经武迎进帐房，如礼相见已毕，提起此行目的：“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已经签定。中央对达赖活佛非常关心，希望达赖活佛早日返回拉萨。我想明天就会见达赖活佛，转达中央的意见。”然巴干笑了几声说：“张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西藏，自然应及早拜谒达赖佛爷。根据惯例，明日朝见达赖佛

爷时，由达赖佛爷升座，百官傍侍，然后张代表经传唤进殿。达赖佛爷下座迎接毛主席大函，然后即升座。在座旁右侧给张代表和部长设座。不知张代表是否同意这种安排？”

张经武没有说话。乐于泓立即反对：“这个仪式不妥，不能表现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正确关系，也不能表达达赖喇嘛对中央政府的拥戴态度。我建议仪式改为这样，我们上山后，先在帐篷中休息，然后直接到达赖卧室见面交信。”

张经武点点头：“我同意乐部长的建议。这次阿沛作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到北京，周总理亲自代表中央去迎接，是何等的重视，何等的礼敬。中央代表到了西藏你们怎么能够以传唤的方式让中央代表拜会达赖呢？这不是太不礼貌了吗？”

然巴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张经武的方案。第二天近中午时，然巴噶伦亲自率领仪仗，迎接张代表一行去会见达赖。当时达赖住东噶庙上，名曰庙，其实是一座大帐篷。张代表一行走上山来，噶厦及僧官百余人在帐前迎候，大家如礼相见，由噶伦陪同张代表一行休息。过一会儿，然巴进来请张代表去达赖内室，张经武一行进了达赖卧帐，达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来与中央代表握手相见。张经武向达赖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函。达赖表示感谢并请张代表一行就座。

大家坐定后，张经武仔细打量了下达赖，看他年纪轻轻，只有十八岁，但由于本人聪慧，又有经师指导，小小年纪，已经历阅政治风波，所以说话干练，城府颇深。仔细地读完毛泽东的信，又想了好一会儿达赖才问道：“毛主席身体好

吗？张经武回答说：“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他很关心大师，希望大师早日回到拉萨。”达赖说：“感谢毛主席的关心，我准备六天后即动身回拉萨。请你转告毛主席，由于我这里没有协议的副本，现在无法对协议表态。再过几天，阿沛就要带正式文本到拉萨了，那时我们应可以正式表态了。不知张代表意下如何？”张经武说：“大师的想法我完全理解。不过协议的内容已经电告噶厦，大师早一点表态，会提高大师的政治威信，这些还请大师三思。”达赖说：“还是等等，不就是几天吗？”

乐于泓看这个话题也只能到此为止了，为了掌握谈话的主动权，对达赖说道：“张代表的话还希望大师多考虑。另外解放军马上就要进藏，期望大师指示地方政府帮助大军进藏。”

达赖和噶伦们听到解放军进藏，他们也明白，这是经他们同意，写上了协议的，不好多说什么。好半天，达赖才说：“这个问题也等阿沛来后一起商量吧。”

张经武见会见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告辞了回到中央代表驻地。

第二天，陪同阿沛到北京签订协议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凯墨也赶到了亚东。张代表派人请他来议事，凯墨等人按时来到。大家如礼坐定后，乐于泓即说：“关于协议问题，我们昨天已与达赖活佛谈了。张代表已带来了协议的抄本，噶伦也都见了中央代表和毛主席的信，噶厦应及早表示态度才对。”凯墨说：“还是等阿沛来和诸噶伦见了面，噶厦再表示态度吧。”张代表说：“协议是大家签了字的，是一定要执行

的。还是尽早表态，这样对达赖活佛有好处，对西藏人民有好处。另外，我们想请噶伦转告达赖佛，班禅大师已数次通电拥护达赖大师。为了团结，是不是请达赖大师对班禅大师有个态度才对。”凯墨说：“张代表有所不知，这里面有一件很麻烦的事。认选转世灵童，一般都要认选上一世活佛圆寂一二年之后出生的孩子。投生转世，至少也要十个月以上，十月怀胎嘛，而十世班禅呢？九世班禅曲吉尼玛是1937年12月1日在玉树寺圆寂，两个月零18天后，十世班禅宫保慈丹就诞生了。仅两个多月，怎么来得及诞生新的灵童呢？不过这都是老例，佛祖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可得知的。我这就把张代表的话转告达赖佛。”张代表说：“这就对了。达赖、班禅两位大师尽释前嫌，握手言和，乃是西藏僧俗民众日夜翘盼的啊。”

凯墨从张代表辕帐出来后，即去达赖处转告了张代表的话。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不行。宫保慈丹距九世班禅圆寂只有两个多月，怎么会是转世灵童？”凯墨说：“佛法无边，你我凡夫俗子哪能理解？不要说上世班禅已经圆寂，就是在世时，他的灵魂还不是依附在别的人身上？安知宫保慈丹不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达赖点点头说：“凯墨的话有道理，对佛法的了解比较精当。你们先退下，待我占卜，便见分晓。”

众人退下，达赖焚香占卜。大家都紧张地等待占卜的结果。卦词出来后，达赖稍加研读，即知宫保慈丹确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当即宣布：“经我占卜，宫保慈丹确是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我要向十世班禅发电，请他尽快驻锡扎什伦

布寺。以便弘场佛法。”凯墨闻命下去起草电文去了。达赖又问然巴：“我们后天就要回拉萨了，准备的怎么样了？”然巴回答说：“已准备好了。”达赖问：“张代表呢？跟我们一起走吗？”然巴回答说：“是的，中央代表护送佛爷回去。”

达赖在亚东的行辕乱纷纷地准备起程回拉萨，班禅大师在5月30日给达赖大师发去电报后，即去南方参观访问。所到之处，人们载歌载舞欢迎大师来访，当地主要行政官员都来迎接，礼仪非常隆重。班禅心里非常感动，决心一辈子拥护中央领导，建设好新西藏。6月28日，班禅回到青海塔尔寺，稍加休息后便召集堪厅成员开会，布置支持人民解放军进藏事宜。

这样等了半个多月，计晋美喜气洋洋地跑来报告：“达赖大师回电了。经达赖大师占卜，确认佛爷是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班禅一把夺过电文急匆匆读起来，只见电文上写着：“5月30日来电，此间于6月4日悉，甚慰。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决定后已公布扎什伦布寺。现在希望您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先来电为荷。”班禅看了发电的日期是藏历7月19日，而年达赖佛已经从亚东起身，向西藏进发，不久便电迎“班禅进藏”。

## 阿沛·阿旺晋美成为 西藏解放的和平使者

1951年7月21日，达赖在中央代表的护送下，从亚东出发，向拉萨进发，入主布达拉宫，僧俗人众夹道欢迎，接受达赖佛的摸顶祝福。

诸事已结，达赖即同噶伦商议，派人迎接班禅进藏。噶伦中虽然有人不太满意，但因班禅身分已经达赖占卜认定，所以不敢阻拦。商议结果，决定派出僧俗官员和西藏三大寺代表十余人亲往青海塔尔寺迎接班禅进藏，并派出藏军第五代本沿途保护。商议已定，即令噶厦部署行动，去电班禅，通知进藏有关事宜。

噶伦们走后，达赖又想到了执行协议的事。这时他已感到共产党确实不同于国民党，十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消除了自己和班禅的隔阂，班禅已通电明确表示拥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自己又安然回到拉萨，班禅也不久即来西藏，动乱了多少年的西藏出现了空前的祥和气氛，自己也应该对协议早些表态。无奈阿沛正和18军在来藏的路上，无法看到协议的文本。想到这里达赖不禁有些着急。

正当达赖为此事操心的时候，凯墨跑来报告，阿沛已同18军王其梅副政委领导的先遣支队到了大昭，再有8天，即可到达拉萨。达赖算了一下日期，阿沛可于8月25日到达拉萨。他吩咐凯墨：“阿沛一到，即让他来见我。”凯墨答应了，

给阿沛发电，催他快来拉萨。

阿沛·阿旺晋美随 18 军先遣支队于 7 月 25 日从昌都出发后，一路跋山涉水，往拉萨进发，阿沛·阿旺晋美是噶厦的噶伦之一，昌都解放后，担任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又受达赖的派遣，作为噶厦首席代表，前往北京和中央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在北京期间，他和其他西藏代表备受中央关怀，同时也感到西藏上层一些人总想阻止解放军进藏是如何的不明智啊！北京一行，代表们大受教育，纷纷写信给自己的家属不要移往国外。协议签订后，阿沛和张国华商定，决定先去昌都，陪同 18 军先遣支队一同进藏。

先遣支队共有 300 多人，包括一个强悍的战斗连、一个文工队和一些工作人员，由 18 军副政委王其梅亲自担任司令员，18 军的一些师职干部担任其他领导工作。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噶与先遣支队同行。

从昌都到拉萨，江河阻行，关山万重，再加上空气稀薄呼吸困难，真是备尝辛苦。阿沛虽是藏人，也很少走这条路线，对在冰天雪地、人烟稀少的高原上跋涉不大习惯。虽然他们骑马，但很多地方根本不能骑马，只有和战士一起步行。

西进途中的一件小事令阿沛十分震动：

先遣支队走到嘉黎时，部队已经断粮。在营地旁边的小河里，一尺多长的大鱼游来游去，大家数数，至少有几百条。人们议论纷纷，商议着把这些鱼抓上来，煮了，美美吃一顿。但因为部队来前受过教育，知道藏胞禁忌抓鱼吃，所以虽然议论，并不敢动手。王其梅司令员听说有人商议抓鱼吃，马上跑来干涉，下令战士们离开小河，战士们闻令都走开了。

在战士们议论着抓鱼的时候，阿沛不动声色，在帐篷里悄悄地看着。共产党是不是真的尊重藏族风俗习惯，现在是最好的考验机会，还有什么比断粮更难受的事呢，他看了一会，发现这些解放军果然纪律严明，虽然嘴里不住地议论，但没有一个人动手。他点点头，叫来亲随，附耳几句，那亲随连连答应，转身出门，当天夜里，便给解放军送来不少粮食和山羊，他深为战士们秋毫无犯的作风感动，王其梅也十分感谢阿沛的豁达与真诚。

10月25日，先遣团渡过拉萨河，进驻拉萨东郊，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领的18军直属部队也同时到达拉萨。拉萨河西岸，人欢马叫，战士们军容严整，准备举行隆重的大阅兵式。

阿沛同时进宫朝拜达赖，奉上协议正文。达赖和噶伦们看到十七条协议都是他们在电文中答应的，便无话可说。

1951年10月26日，18军举行入城式，在拉萨东郊恰曾林卡的一片空地上，搭起了阅兵式检阅台。台子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台子上方，悬挂着“拉萨各族各界欢迎解放军大会”的会标；检阅台两侧，竖挂着两条大标语：“庆祝西藏和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胜利到达拉萨”。入城开始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副政委王其梅、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拉鲁·才旺多吉、朵噶·彭措饶杰、夏苏·举墨策仁多吉等人登检阅台。拉萨僧俗人两万多人围在会场周围、观看阅兵式。

阅兵仪式上有两件事让阿沛·阿旺晋美感到隐隐不安：

当他高声宣布“西藏各族各界欢迎解放军大会现在开始”

时，雄壮的阅兵式开始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解放军以连为单位，排成整齐的方队，迈着正步走过主席台前，口令此起彼伏；人人头戴钢盔，军容严整，动作训练有素，赢得阵阵掌声；而随后入场的藏军，吹着号，打着洋鼓，军乐低沉，队形不整，动作散乱，形同流民。尤其是两军分别在主席台两侧相邻而坐时，相比之下真是泾渭分明。

另一件事，是阿沛宣布升国旗、奏国歌时，18军炮兵部队奉命鸣放礼炮，而炮声一响，藏军顿时大乱，忽地站起，操枪上膛。阿沛连忙高喊：“这是大会的礼炮，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喊了一阵，藏军才平静下来，冲散的群众也跑回来了。

升旗仪式后，噶伦阿沛·阿旺晋美讲了话，拉鲁·才旺多吉致了欢迎词，表示热烈欢迎解放军进藏，拥护西藏和平解放，拥护“十七条协议”，算是代表噶厦正式表示了态。张国华代表进藏部队讲话，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西藏人民的问候，表示要为执行协议，保卫好祖国西南边疆而奋斗。

大会结束后，18军以红旗、军乐队为先导，在《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军乐中开始入城。藏军满怀敌意地站在会场出口的两旁，端着英式老步枪，刺刀朝下，有意划破经过的解放军战士的绑腿。部队忍辱负重，为了照顾大局，没有理会藏军的小动作，倒是拉萨人倾城夹道欢迎解放军入城，18军文工队也打着腰鼓，在八角街上行进，更增添了古城的喜庆气氛。

在18军进军西藏时，西北第一野战军部队从阿里入藏，

西南第二野战军十四军部分部队进军察隅。进军西藏的任务至此完成。

达赖喇嘛同阿沛等人协商后，于10月28日致电毛泽东，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正式表示了态。

## 班禅大师还未进藏， 他就愤怒地说，“这个脓疱 总有一天要破的。”

班禅大师在青海，得知18军已经入城、达赖佛也已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感到进藏的时机成熟，便于12月来到西宁，准备启程返藏。毛泽东特地委派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代表自己和中央人民政府赶往西宁为班禅送行。班禅非常高兴，命令堪厅组织盛大集会，欢迎中央代表。欢迎会上，班禅真挚地讲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亦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习仲勋也发表了讲话，称赞了班禅的爱国热情，祝班禅一路顺利，早日安抵西藏。

散会后，习仲勋对班禅说：“中央让我转告您，您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

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班禅说：“我想回到日喀则以后，先在后藏进行民主改革。”习仲勋说：“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稳进的方针，条件不成熟的事不要办。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这是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班禅点点头说：“我记住了。”

12月13日，班禅在堪厅和噶厦代表、藏军第五代本的护送下启程返藏。行经三个多月后，终于翻过唐古拉山，拉萨已经不远了，班禅满心欢喜，突然西藏工委来电，计晋美看完电报后大吃一惊，连忙过来报告班禅：“大师，拉萨出事了。”说完把张经武的电报送给他，班禅看完电报也大吃一惊，说：“这个脓疱总有一天破的。”

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西藏上层一些官员抵制协议，企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把他们赶出西藏。他们用低价强行购买藏民的柴草和牛羊，不准他们把食品卖给解放军，但解放军有强大的后勤支持，自己又开荒种地。

他们见阴谋诡计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便唆使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组织伪“人民会议”，煽动一些人在八角街上游行示威，派出藏军包围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阿沛·阿旺晋美住宅，向中央代表张经武将军呈交请愿书，要求解放军撤到内地，依照前清治藏办法，西藏不驻军队，只留中央代表，一时间闹得拉萨乌烟瘴气。

事件发生后，张经武将军、张国华将军数次约见达赖和噶伦，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是破坏协议。阿沛·阿旺晋美数次对达赖陈说利害，班禅又来电责备鲁康娃等人。达赖喇嘛感到鲁康娃等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下令解散伪“人民会

议”，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个司曹的职务，一场闹剧顿时烟消云散。

此后，解放军生产自救，工委又开放边贸，康藏、青藏两大公路也在1954年通车，内地物资源源不断运进西藏。驻藏部队和干部不用西藏人一草一粮，反而不断接济分百姓，僧俗百姓安居乐业，人人称道解放军是天菩萨。少数反动分子无计可施，便唆使一些无赖向解放军战士挑衅，怎奈解放军战士骂不还口，这些坏分子倒是日益孤立。

事件平息后，班禅喇嘛加速向拉萨进发，终于在4月28日到达拉萨。

西藏工委和噶厦及拉萨市民举行盛大欢迎活动，庆贺班禅安抵拉萨。当天下午，班禅即去布达拉宫拜会了达赖喇嘛，交谈数日，交情愈厚。

一个多月后，班禅离开了拉萨，经数日跋涉，终于回到了离别三十年的驻锡地——后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

张经武将军见两大活佛会于拉萨，一野二野进藏部队均已到位，便起草电文向中央汇报。又一件大事完成了，毛泽东自然非常欣喜。

## 班禅不幸而言中： 骚乱一步步升级……

1958年，大跃进运动遍布神州大地，西藏上空却笼罩起了一层阴云。

4月以来在金沙江以东藏区活动的叛乱武装卫教军遭到我平叛部队的沉重打击，支持不住，渡过金沙江，窜扰西藏，总共有6万人之多，主要集中在昌都、山南和黑河。噶厦庇护纵容他们的叛乱活动，用各种方式供给他们武器给养。这些叛军野蛮杀害西藏僧俗群众，疯狂袭击我军车队和小部队驻地。我军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当国防部长彭德怀向中央汇报情况时，毛泽东果决地说：“我是军委主席，我命令，如果叛乱分子公然攻打政府机关、学校，破坏交通，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履行其保卫的职责。”彭德怀高兴地回答说：“是，我立即通知谭冠三。”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毛泽东拿起电话问道：“我是毛泽东，好，说吧！”毛泽东听完电话，转过身来说道：“谭冠三来电，西藏又出事了，噶厦通过西藏工委向中央提出要求，请中央直接出面处理叛乱事件，如果由噶厦直接负责西藏治安的话，中央就得发给他们武器。”彭德怀叫起来：“主席，坚决不能发给他们武器。”毛泽东笑笑说：“老彭，你别急嘛，我还不至于让他们给耍了。”

彭德怀回到国防部后，立即同在京的张经武、张国华两将军商议自卫政策，两张完全拥护中央自卫的决定。彭德怀立即拟定电稿，发给西藏的谭冠三将军。驻藏部队接到命令后，加倍警惕，准备随时痛击来犯的叛军，西藏不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由于解放军只是自卫，以打退叛军的进攻为原则，因此叛军的实力没有受到打击。他们利用西藏驻军、机关分散的特点，偷袭、伏击自卫力量不强的小分队和军队、解放军和地方工作机关损失惨重，大量人员牺牲。叛匪把抓

到的战士职工，剥皮挖眼，残酷杀害。大量藏军这时涌入拉萨，和叛军一起闹事寻衅，噶厦政府在布达拉宫连连召开会议，部署叛乱行动。

1959年早春的拉萨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

西藏军区司令部积极作应变的各种准备，谭冠三政委在军区主持军事会议，听取各军分区的关于匪情的报告。从山南、黑河赶来的干部报告了叛军在这些地方的活动，这些叛军，虽然打着卫教军的旗号，实际上是一群祸害百姓，破坏宗教的土匪，烧杀抢掠，奸淫僧尼，毒打僧众。山南的叛匪为了逼一位活佛献出金钱，竟用熔化的铁水把这位活佛灌死。黑河等地的群众眼见土匪横行，自己组织起来与抢掠的叛匪斗争。有一次一伙土匪前来烧杀，被群众武装包围，二十多名叛匪束手就擒，全被群众捆起来扔到河里。

正汇报间，山南军分区来了一封急电，谭冠三看完电报，气愤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对大家说：“同志们，噶厦公开支持叛匪。他们明明知道山南叛匪活动猖獗，却偏偏在山南建立了一座军火库，运去近一千支各种枪支、追击炮和大量弹药，只派很少的藏军守着，故意放手让叛军抢去全部军械。这事我们一定要管。现在藏军主力已涌到拉萨。布达拉宫、药王山制高点都已被藏军占领，罗布林卡成立了叛乱指挥部，形势一触即发。从现在起，全军停止生产，进入戒备状态。”

这时藏军加紧军事部署，叛乱迹象已十分明显，不少藏族僧俗群众要求解放军平叛。解放军领导屡次派人规劝噶厦，请务必遵守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噶厦虚与委蛇，暗地里寻找口实，发动叛乱，不觉就到了2月初。

2月初是西藏的“驱鬼节”，按惯例布达拉宫举行盛大的跳神活动，谭冠三政委接到达赖喇嘛的请贴，请他去参加布达拉宫的跳神活动。

布达拉宫是一座庞大的建筑，建在山腰，砖石结构，异常坚固，内有房屋千间，曲廊暗室不计其数，现在已是藏军屯驻的所在。值大乱即将来临之际，去布达拉宫观看跳神，就像关云长单刀赴会。去不去呢？很多人劝谭冠三不要去，怕吉凶多。谭冠三想想，果决地说：“必须得去，不去，噶厦就会以此为口实捣乱。”说完，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等几位负责人仅带少数警卫去赴会。

噶厦政府已在布达拉宫山脚下布下藏军岗哨，谭冠三和其他负责人谈笑风生，穿过层层刀丛来到达赖住所互献哈达。谭冠三身处虎穴，谈笑风生，参观了跳神活动，胜利返回。

就在举行跳神这天达赖喇嘛向邓少东和郭锡兰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工委、军区负责人立即表示欢迎。3月1日，西藏工委统战部派人去罗布林卡请达赖确定来军区礼堂观看节目的时间，达赖说：“藏历元月是传召大会，我不能离开。传召大会后，我一定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达赖喇嘛答应去军区礼堂看戏的消息很快在拉萨传扬开来了，噶伦们指使一些人借此造谣惑众散布“汉人要劫走达赖喇嘛”。一时间流言大起，噶伦们又反过来哄骗达赖，说解放军请看节目是假，乘机扣留他是真。还胡说“汉人要消灭

宗教，杀活佛”等等。

达赖只好写了一个便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挟持，无行动自由。信写好后达赖让一个心腹侍从送给谭冠三。谭冠三见信，急派要员再次去向噶厦交涉，务请达赖来军区礼堂看戏，噶厦拒不转达。谭冠三闻讯，又派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去布达拉宫，噶伦们立即唆使藏军痛打桑颇，等到部队赶去把他救回来时，桑颇已被打成重伤。

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这时已回到西藏，刚要去医院探望桑颇，忽听拉萨街上传来阵阵人喊马叫声。二人大惊，急欲派人探听，只见一个参谋急喘喘跑来报告：“自治区筹委会干部索郎降措被叛匪杀害，并在街上纵马狂奔拖尸示众。”

张经武急令：“快去把他抢下来。”参谋领命带了一连人冲出去了，叛匪看到部队冲来，跳下马躲人民房，部队把索郎降措的遗体抢下来。

这时，拉萨街头秩序大乱，藏军武装游行，一些叛乱分子向解放军战士挑衅，不明真相的僧俗人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保护达赖。噶伦们见叛乱时机成就，在罗布林卡开会。

决定3月10日正式进攻西藏工委、军区驻地和自治区筹委会。

是夜，藏军和原已叛乱的卫教军七千多人一齐出动，占领了拉萨市周围各制高点，叛军不断地向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驻地开枪射击，拉萨市内火光冲天，叛匪抢劫商店，焚烧寺庙，拉萨城内一片血雨腥风。

张国华挥师平叛，请班禅大师替天行道。

张国华等人深知叛乱形势已成，为了说服藏军不要叛乱，连续派出多人和噶厦、藏军接触，劝告他们遵守十七条协议，但噶厦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时达赖一连三次给谭冠三将军写信，说明自己被人劫持，无法制止叛乱发生。张国华等人眼见叛军步步进逼，只好调动部队加强防卫。

叛军们开始疯狂地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等机关驻地冲击，驻藏部队被迫自卫还击。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一方面调动部队，一方面紧急报告中央：叛军劫持达赖，拉萨局势严重，叛军已大规模进攻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驻藏部队被迫奋起还击。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视察，3月11日毛泽东致电党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给了精辟分析，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还指出：“这种‘被迫’是好的。”他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急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分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并指示工委争取在拉萨大打一仗更为有利。12月中央转发毛泽东的电报到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张国华高兴地一拍桌子说：“好！”他立即把电报给张经武、谭冠三、及西藏军区负责人阿沛·阿旺晋美少将、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及邓少东、詹化雨、王其梅诸将军看了，大家在地图前会商了一阵，决定了军事部署。张国华遂拿起电话，紧张地向各部队发出命令：“我命令，各部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准备出去，坚决平息叛乱。”部队接到命令后，一面抵抗冲来的叛匪，一面作出击的准备。

达赖及其随同人员索康、柳霞、聂苏三个噶伦，达赖经师林仓、副经师赤江，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副官长帕拉、达赖的母亲、姐姐，一代本彭措扎西、二代本扎西白惹；四代本多卡色和随行亲属及担任警卫的 200 名藏军共 600 余人，于 17 日夜 10 时左右，乘当晚夜色昏黑，拥着达赖出了罗布林卡后门，渡过拉萨河，去往山南，从那里又去了印度。

3 月 20 日上午 10 时整，两颗刺眼耀目的信号弹从军区司令部升起，与叛军相持的解放军十几个连队，立即喊着杀声冲向叛军。叛军起先还负隅顽抗，但他们哪里是解放军的对手，很快被平叛部队分割包围。这时刚从农场赶来的炮兵连匆匆推出大炮向药王山叛军阵地猛轰，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步兵连队分两路冲上药王山，消灭了山上的叛军，控制了制高点。

现在只有罗布林卡的叛军据点还未攻克，这里驻着叛军指挥部和大量叛军部队。为了攻克这座据点，在攻战药王山后，解放军马上调集力量向罗布林卡外围发起攻击。战斗在下午 7 时半打响，经一小时激战，解放军部队即攻进罗布林卡。拉萨叛匪顿时群龙无首，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3 月 22 日下午七时，盘踞在大昭寺内的最后一股叛军举起白旗投降。

经两天激战，拉萨叛乱已被平息，俘获叛军四千多人，缴获枪炮无数。3 月 23 日，中央委军下令解除藏军武装，西藏军区接到命令后，一面组织部队奔袭逃窜在山南的叛匪，一面命令日喀则分工委同班禅协商，执行中央的命令，解除驻在后藏的第三、第五两个代本的藏军武装。

班禅大师当时驻锡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对拉萨叛乱之事毫无所闻，听了日喀则分工委的情况介绍后，不禁大惊，转而又点点头说：“这个脓疱总是要破的，早破比晚破好。毛主席说过，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只不知达赖佛现在怎样了？愿佛祖保佑达赖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愿佛祖保佑达赖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

在班禅大师的配合下，日喀则分工委和驻军顺利解除了两个代本藏军的武装，解散了噶厦政府派驻日喀则的基地，所有编遣人员一律按照本人的志愿给予妥善安排，或参加工作，或领取路费自行回家。班禅对和平解决后藏的问题感到非常满意。

拉萨叛乱被平息后，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3月28日下达了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希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藏僧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巩固国防，保护各民族人民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奋斗。

班禅接到国务院命令后，立即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完全拥护国务院命令。第二天，他又出席日喀则界人士的集会，对大家说：“西藏地方政府的叛乱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真是罪恶累累，恶贯满盈。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武装已经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惩罚，这是他们自寻绝路得到的结果。他们是罪有应得的。现在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劫持，我

已经多次祈祷佛祖保佑达赖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在他被劫持期间，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决定，我将竭诚努力，和大家一起，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出席集会的各界人士对班禅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几天以后，班禅即从日喀则动身来到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又过了几天，他从拉萨坐飞机去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由于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到印度，西藏问题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

此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中央多次邀请达赖回国，但达赖始终犹豫不决，转而一意孤行，在海外进行不利于祖国统一的宣传活动，但西藏各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共同开创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叛乱事件。

## 鲜为人知的“文革”发动内情

一、1965年11月林彪让叶群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最后相信了叶群的话。

1965年12月7日，接到通知要我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当时我正在下面抓“四清”。

7日，我从河北永年县赶回北京，8日由北京飞到上海，行前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12月9日开始开会。会议由林彪主持，毛主席没有参加，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罗瑞卿。

批判罗瑞卿的起因，是11月林彪让叶群从苏州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罗的状。林让叶到杭州，告诉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找到主席。叶群到了杭州也不容易见到毛主席。主席也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让她等。她就和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

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又去，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这样才见到毛主席。

据说讲了5个小时，主席听了5个小时。主席问得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最后，毛主席相信了叶群的话。

这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视察工作。12月10日，中央要他

马上回来，到上海开会，罗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到通知就飞到上海。一下飞机，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迎接，将他送到一个地方，警卫森严，实际是软禁。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明其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始终没有参加会议。李井泉不知道，还给罗瑞卿送橘子。

我参加的那个组是总理主持，有贺龙，还有叶群等知情人。

叶群在会上介绍她与主席谈话的过程。她揭发罗瑞卿和刘亚楼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刘已于1965年5月病故，生前为空军司令员）说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

（一）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二）要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

（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四）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还说罗骂林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

雷英夫和我在一个小组，表现十分活跃，大讲罗对毛、林不满，等等。

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在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批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现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

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

我当时想，罗是听毛主席话的，和毛、林的关系从来都是可以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现在这样？！

会上规定不准记录，也没有讲怎么传达。会议开得十分秘密。13日会议结束。

16日我飞回北京。要向下传达，因为没有记录只能是口头传达。我当时兼北京军区政委，在军队本应由军队的廖汉生同志传达，但他说军队、地方一块传达，非要我传达。我是第一政委，没办法，只好传达了。我也没多说，写了一个很短的担纲，后来又在华北局传达，要点就是毛主席决定开会，大家都赞成。会后，军队就开始批判罗瑞卿了。

搞掉罗瑞卿，不等于说毛主席就十分信任林彪。主席考察干部是反复的、长期的。他批评彭德怀时就说过林彪：“别的事情都是马列主义，就是对他自己的病的看法是唯心主义。”林将自己的病看得过重，迷信中医。抗美援朝这么大一件事，高级干部应该为之拼命的，然而主席提出让林彪指挥时，他竟推了，还认为不应出兵，自己跑到苏联养病去了。这件事和斯大林有什么关系不知道，但很可能是走的高岗这条线。高岗和斯大林有直接的来往，而高岗进行反刘少奇活动首先找的就是林彪。联系到早在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上林就反过主席，主席碰到困难的时候，林会怎么样，主席一定会反复考察的。

1964年9月28日至10月12日，罗马尼亚领导人毛雷尔、齐奥塞斯库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劝中国同苏联和好。主席顶了，意思是不行，要和好，苏联总要有个表示，先讲话（自我批评），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应该是他们的：林彪就在一旁说百分之九十九。“文革”初期，主席讲不宜搞急刹车；林就赶快讲“如果急刹车可能摔下来。林总是这样，总是表示和主席的意见完全相同，而且讲的比主席讲的还厉害。主席一讲完话，他马上讲两句话，第一句是毛主席发表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二句是我完全拥护。他的这些作法也可以使主席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你一直捧我做啥？实际上，林越是捧主席，主席就越警觉。本来，把罗瑞卿搞下去，林彪就突出了，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牢牢掌握着军队，不然为什么定了一条：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

二、第一次杭州会议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

1966年上半年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酝酿时期。

上海会议后，1966年1月21日，江青由上海赶到杭州和林彪商量“文艺革命”问题。林向总政下达指示，2月2日至20日，江青根据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说：“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时候了”。3月22日林彪将座谈会纪要报中

中央军委。纪要经毛泽东修改三次，再由林报中央，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3月8日凌晨，邢台发生地震。我们正在天津召开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8日晚周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我当时表示要去邢台。总理说：你先不动，我先去。

总理赴邢台视察后，12日到16日在天津参加华北局的会议。16日总理作报告，会议结束，我们回到北京。

会议还未结束时，我就接到通知，让我到杭州开会。

17日我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而后乘火车到杭州，我们住在新落成的西泠宾馆。忙中偷闲，住下后游了苏堤。

当天下午5时我们就到主席那里开会，主席住在刘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成员加上六大区书记，总理、彭真都在。小平同志投有来，他为了躲开处理罗的事，到三线视察去了。林彪似到场。

这次会议我有记录，会开得很自由，没有正式报告。主要是毛主席讲。他先是扯些闲话，很随便的，然后讲到文化革命，点了乔木的名字（他未到会），批评了吴冷西。毛主席讲吴冷西、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你们自己做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大家也听出来不只是这几个人的，而是批评文化工作方面的问题。主席也没有讲得那么透。

大家听着，哑口无声，谁也不能表态，陶铸是勇敢的，敢讲话，这次也很谨慎。参加会议的人相互之间也不敢多说话，又都想试探一下，了解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也不敢

主动。

当时彭真的地位还可以，还是中央秘书长的角色，还管着罗的事。记得会议中间，他去接电话，回来说罗（3月18日）跳楼把腿摔坏了。这时毛主席有些惊讶的样子，问：

“为什么跳楼？”然后讲了一句：

“真没出息！”听起来那意思是官司刚开始打，就跳楼，官司还在后头呢。

我想主席还在观察，从以后事态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主席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中央还未做结论嘛。

主席还在考虑还可能牵扯到什么人。

3月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议罗的揭露就多了。一边倒，群情激愤，光听会上揭发的事，那么罗的问题就大了。

20日上午会议结束。

21日，陶铸领头，大区书记们参观了花坞、玉泉。我们离开杭州到上海。23日从上海飞回北京，当天召开书记处会议。

三、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要王任重整理主席的讲话，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但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

会后马上就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又叫政治局常委扩

大会议。

我于14日从邯郸返京，15日飞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当时来的人比较少，就安排在西泠饭店（八层楼）。

彭真来得晚，我们还换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层。

叶帅也来得晚，来了就问我：“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月不是刚开了会？”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叶帅说：“送彭真上飞机，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话，说现在又出事了，我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后，要求和毛主席见面谈话。彭真和徐业夫讲话时我正在旁边。彭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20分钟。请你转告。”徐业夫会转告的，可是主席没有见彭真。这样我们就知道事情大了。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并加《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有所检查，并提到《前线》发刊词。康生讲这是个假批判，真包庇，假装自我批评。又说《前线》也发了一篇文章，文章我始终没有看到。我们知道“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是按照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19日开始开会。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里开了几次会。主

席谈得很活跃、和缓，但讲话中插的那几句话就重了。主席说：北京的空气很沉闷，他不愿在那里住，他愿到上海来。那时柯庆施和江青已联系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来密谋策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文。

我们都在西泠饭店。吃过饭，出去散步，六个大区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一个和彭真并行，并且都不和他讲话。我还和他讲话，因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级，关系可以。但我们也只讲些废话，“天热了……”等。谁也不敢讲正题。

4月21日少奇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后回到杭州，主持了类似政治局的会议。刘少奇主持，总理讲话，因为少奇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总理主持。在会上少奇点了两个人的名。

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将毛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王任重记录的特点是谁的话都记，但只记要点。我的记录是记毛主席的原话，但是别人的插话就记不下来了。我一看他的记录同我的不尽相同，就没有往外拿我的记录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后来改动很大，康生说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种说法，比如刘志坚回忆：4月14日总理把他叫到钓鱼台8号楼说，中央确定刘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关于文件的讨论和修改，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俩飞上海，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会议让大家讨论，5月1日刘回到北京。这就是说，第二次杭州会议还没有开，中央已在组织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开始三个人在一起，面对面干坐着，后来宋任穷离开前舱，到工作人员那边，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俩的任务是“护送”他回来。

到机场后，我们各自坐车走了。后来有人说我把彭真交给安子文了，这是不对的。

上海会议搞罗，三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四月会议批北京市委，批彭。这时谁都知道，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四、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并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

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说法是3日开始，先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情况。我更多的精力是在放在北京市、华北局，准备开华业工作会议，工作十分紧张。

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副主席都坐在主席台上。毛

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

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我走进去，坐下看见桌子上放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我拿起来看是林彪的手书，未看得很清楚，大致是说他证明：

- （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 （二）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 （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
- （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彭真已经知道我是接他的工作，他交待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说：“你去了之后……”

他刚开始讲，有人在后面，手里拿着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

此时，当我拿起来看林彪的手书，还未看明白，就听见聂帅拿着林彪的手书，生气地冲着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这等于是给主席台上提意见。

这事和政治局又没关系，这种事还发文件，丢人！可笑！这个文件是针对陆定一和他夫人严慰冰的。这么严肃的会，发这种文件，真让人啼笑皆非！很快文件就收回了。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

从会上看，少奇是同情彭真的，认为他有错误，但不同意这样搞。看得出少奇有气，压力很大，表情不自然。他主持会议，等于反对他自己。总理也很慎重，不讲话。康生挺

得意。

5月16日上午9时，在人大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仍是少奇主持。小平讲话，介绍《五一六通知》内容。

讨论通知时，大家都是赞成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因为是扩大会议，少奇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有权举手。全体举手通过，一字未改。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严重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一通过，形势就严重了。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会议休息了两天；到18日继续开，仍是刘少奇主持。林彪在会上发表讲话，即有名的“五一八讲话”。

林彪在正式讲话前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说：“很好。”

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

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散会了，我们知道常委在那儿开会没有走，陆定一在旁边的屋里等着。

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和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

富春非叫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的。”

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讲。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

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

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

林彪讲话事先做了准备，他有个简单的提纲，字有核桃大，他说：“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

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杀气腾腾，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

林对杨问题的讲法也同邓小平对我讲的不同。小平说：杨尚昆是单干户，他是有事。但是什么事，他也没有讲。

5月23日，会议通过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进行专案审查。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我任北京第一书记。讨论时我说：“我一个人不行，调一个人做副书记。”候选人提了两个人，臭德和华北局的什么人，1936年我和吴德搭过班子。他在枣园工作过，康生了解他。最后决定吴德任第二书记，郭影秋、高扬文、马力为书记。

24日又发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这两个文件都下发到县团级。

五、5月25日康生、陈伯达设圈套；骗我到北大讲话。

5月25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学生食堂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乎、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陆乎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彭珮云是北大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北京市委

大学部和北大校党委，也就是指向北京市委。后来才知道这是康生搞的，他早就派他老婆曹轶欧等人在北京大学串联了。

大字报一出来就将党内矛盾公开了，而且这是1957年以来第一次在北大出现大字报，一下子就引起轰动。学校内部，学生马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拥护大字报的。两派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形成对立。在辩论中青年人气火大，有个人动手，发生推推搡搡。而且北大有许多留学生，消息马上传到国外。北大的校门历来是敞开的，外面的人闻讯后纷纷进去看大字报。

这天晚上我接到陈伯达的电话，他要我去北大，说：“形势严重，怕大字报上街，怕串连。现在很多人到北大看大字报，怕人们上街游行。”看来他们放了火，还不知毛主席的态度，怕火烧到自己，急于稳住阵地。

我说：“我不能去，因为中央没有正式通知，师出无名。”这时吴德已到北京，但我和吴德还未正式到北京市委上班，以华北局的名义去也不行。

陈讲：“形势严重，很可能发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贴大字报要作工作，不要上街。”我想，非中央讲话不可，我也不能给主席打电话，现在夜半三更，也不能和少奇联系，因而没有答应。又拖了一下。

陈伯达着急了，第三次给我打电话，话讲到这种程度：“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我还是不答应，他又说：“我们一块去。”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已内定是中央文革小组开，负责运动的。我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

这时外事办副主任张彦也来电话说：

我刚从康老那里回来，康老要你和蒋南翔一起去。康生的意见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张彦说：先和你打个招呼，康生还要找你。

过了一会，康生就来电话了。我先讲了张彦转告的话，他说：蒋南翔已经来过了，你不来也可以。我说：陈伯达来过电话，要我讲话。康生听了没有多的话，表示可以。

这时，陈伯达又来电话催我。我说：“我等你。”我考虑，我一个人上台让群众一包围，我连个报信的人也没有。我抓解学恭、池必卿来开会商量。我说我在台上，你们散在台下，聂元梓是太行的干部，池必卿可以做聂的工作，和外面的人通信。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已是12点多了。我和陈伯达联系。陈这时却说：“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陈伯达要我去北大后开个紧急会议。（这暴露了康、陈两个人的互相勾结。）

我赶到北大临湖轩时，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也在。他们在礼堂召开八百人的党团员干部会，而且已经开过了。我先听了一段汇报，就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蒋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陪我上主席台是刘仰峤和张彦。又要开会我讲什么？我就叫张彦再提供一些情况，传达周、康、陈的指示。我一边听一边想，心里生气，为什么把我推到台上，算啥！我请张彦先讲讲，我主持会。他不讲，我问总理还有什么指示，他

说没有了。

等于原班人马又开了一次会，在党团干部会上我讲了 25 分钟。后来群众概括为几条：

1. 不提倡写大字报；
  2. 大字报要内外有别；
  3. 要有领导；
  4. 要有步骤；
  5. 不一定开大会声讨；
- 等等。

会后，我回到家里，睡不着，心里考虑，中央还未吭气，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

天还没大亮，就给少奇打了个电话，不想碰了个钉子。我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一个话，他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我赶快就说：“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少奇说：“那也不要。”说完了，他就把电话挂上了。我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在我这儿。这句话把我解脱了。

通过这一天的事，觉得康、陈是对我来了个突然袭击。本来我对康、陈有些看法，但当时也不敢太怀疑，因为他们都是老资格的同志。

六、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放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5月31日，陈伯达亲自到《人民日报》社，改组《人民

日报》社，撤了吴冷西的社长职务，宣布中央确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中央派的第一个工作组，而且由陈伯达宣布，并由他领导。

改组后的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这篇社论实际将林彪“五一八”讲话精神公布与众。社论宣布“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6月1日，我们正在开华北局会议，由我传达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下面递了一个条子，说是由康老那里送过来的文件。我打开一看是康生写的条子。内容是毛主席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因为时间仓促，看得很匆忙，我已记不清了。因为事关重大，我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6月1日晚8点，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了聂元梓的大字报。毛主席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一下子火就点起来了。

康生欣喜若狂，他有一次在大会上说：“大字报广播后，我感到解放了。”而大字报广播后我就十分被动，因为我在北大的讲话与毛主席的评价显然不同。

当天晚上，张承先率少数工作队员进了北京大学。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

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评论员的文章说：“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从此全国高校陷于混乱，一发而不可收。

## 毛泽东巡视南方

中共九大以后，林彪集团的势力急剧膨胀。他们自以为羽翼丰满，便迫不及待地策划“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1970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一伙利用早已预谋好的“坚持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的策略，向毛泽东，党中央发动突然袭击，扰乱了全会的预定议程，闹得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后在毛泽东的制止下，林彪一伙利用和平方式实施“抢班夺权”的阴谋终未得逞。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内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进一步揭露和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对于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党中央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的办法，一方面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力，另一方面对林彪一伙进行耐心地批评教育。但林彪一伙继续使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以假检讨应付党中央和毛泽东，另一方面则决定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和其他党中央领导人，以暴力方式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正当林彪一伙密谋策划，准备武装政变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已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四届人大会议后，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他的行程大致是：8月14日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

日抵达武汉，停留10天；8月27日至30日在长沙；31日到达南昌；9月3日抵杭州，9月8日晚专车移至绍兴；9月10日到上海，没下车；9月12日下午到达丰台车站，傍晚在北京站下车，安抵中南海，全程为期30天。

毛泽东在南巡期间和返回丰台站时，沿途先后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等5大军区和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等11个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刘丰、刘建勋、王新、华国锋、卜占元、刘兴元、丁盛、韦国清、程世清、韩先楚、许世友、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进行了谈话。

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针对林彪集团的分裂阴谋，总结了历次党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论断。毛泽东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多次点名批评了林彪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毛泽东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

划、有组织、有纲领。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体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有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听，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对路线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毛泽东说：“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

造反！”“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么？”毛泽东在巡视途中，还提出要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此外，毛泽东还批评林彪让叶群当他的办公室主任，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并不指名地批评对林立果的吹捧，说：“20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对于上述谈话要点，毛泽东打招呼，不要向北京传。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对参与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人，犯有错误的人，提出了警告，指明了出路：同时对沿途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打了招呼，提高了他们对庐山会议这场斗争的认识，起到了防止党内高级干部不明底细而盲目跟着林彪的作用，为应付突然事变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

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巡视南方极为疑忌。9月5日、6日，林彪等人从他们党羽的密报中获悉了毛泽东谈话的有关内容，十分紧张。他们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便决定铤而走险，企图谋杀南巡途中的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他们密谋在华东地区用地面攻击，爆炸铁路桥梁、飞机轰炸等手段摧毁毛泽东的专车，置毛泽东于死地。9月7日，林立果向其武装别动队——“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按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武装政变手令。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以他平生丰富的

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断然临时改变行程，提前离开杭州，于9月11日下午乘专列突然驶出上海，一路不停地于12月安全返抵北京，从而使林彪一伙谋害阴谋彻底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南巡讲话，由中共中央整理为《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于10月7日向全党转发，进一步提高了全体党员对林彪集团的认识。

##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1968年10月，我正带人到安徽各地检查生产情况，接到北京电话，通知我作为一个省的负责人，列席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

我于10月11日到达北京前门饭店报到，13日全会开幕。

在开幕式上，毛主席讲话后，周总理宣布分组名单。当念到华东组时，周总理念到我的名字。毛主席接话问：“哪个叫李德生？”周总理介绍说：“李德生同志，是安徽的省革委会主任，12军军长。”他向我招手说：“请你站起来。”我当即戴好帽子，站起来向毛主席、周总理敬礼。

毛主席微笑说：“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

他接着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我回答说：“我是河南省新县人。”

周总理说：“跟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许世友同志坐在我前边，他接过去说：“德生同志同我是一个县的。”

毛主席又问我多大年纪，我答道：“52岁。”

毛主席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那个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

杂了。”

毛主席又问我：“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我立即答了一句：“就是大造舆论。”

这个话简单了一点，但实际上也是我们在安徽一年的工作经验的概括。我们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推动生产，工作千头万绪，都不是靠下命令，不是支一派压一派，而确实实是靠做群众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靠部队的模范作用。

我的话引起了到会同志的笑声。毛主席笑了之后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你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我们在安徽有几件大事，是得到中央肯定的，如合肥两大派联合；芜湖制止武斗；淮南坚持生产，没想到毛主席在这次会上再次加以肯定。我参加红军 30 多年，战争年代极少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解放以后，到北京开会、学习，也只是在接见照像时见到过。在会上对话，还是第一次。

半年之后，1969 年 4 月，我作为党的九大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九大 4 月 24 日结束。在 4 月 28 日召开一中全会之前，会议秘书处送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给大家酝酿讨论。我一看，我的名字印在候补委员的候选名单之中。在这之前，我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同时我看到南京军区许世友、沈阳军区陈锡联两位司令员也在政治局

委员候选名单之中。他们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八届中央委员，对中央情况比我熟。我立即找到他们请教，我说：“你们是了解我的，我干不了这个工作，请你们同毛主席、周总理说说，不要选我了。”

许司令员、陈司令员也看到名单，看来他们比较沉着，都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安排，我们怎能去说这个话。”

4月28日，一中全会选举，投票后，周总理宣布选举结果。在念到我的名字时，毛主席又说：“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周总理示意我站起来，还要我摘下帽子请主席看。毛主席看着我又问：“多大年纪了？”我答复：“53岁。”他重复几遍：啊，53岁。

九大之后，我和安徽代表回到合肥。当时想，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可能是同许世友、陈锡联同志一样，仍然回到外地工作。于是，我按原定部署，继续着重抓省的经济建设。

过了两个多月，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秘书进来要我去接周总理的电话。我走出会议室接过电话机，周总理已经在那一头等着了。他直截了当地说：“德生同志，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我真感到突然。我向总理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

周总理答复说：“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

我放下电话，心情反而平静下来。作为一个军人，对于

上级命令，应当无条件执行。我已经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已经决定，就不能再讲价钱，再有个人的任何考虑了。天大的困难，总不是不可逾越的，还有党，还有群众嘛！我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地市领导打了招呼，7月28日中午，乘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

到了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中办就来电话通知，周总理下午3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见我。

我到了怀仁堂，周总理已经在那里看文件。见我进去，亲切地让我坐下。他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我这个人，是不大愿干简单重复的工作的，在同样的工作中总是想研究点新情况，新问题，更想干点新的工作，往往在研究解决新的矛盾中得到满足，使工作有所作为，有所前进。当时我在安徽近两年，觉得抓经济建设，抓工农业生产，刚开了个头，很有兴趣，很有抓头。我就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的事。”

周总理听了微微一笑，他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12军的职务。”接着，他向我介绍了参加中央政治局活动的特点和要求，谈了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有关情况和工作，鼓励我大胆工作。

周总理又问我带几个工作人员来，家里有什么人，什么时候把家搬到北京来。

我怎么能为这此小事麻烦总理呢。我向总理提出：“我从安徽来的时候很仓促，很多事情没有具体交代，整个工作也要部署一下，可不可以回去几天？”

周总理说：“准你一个月的假，回去安排一下，事情办完了，很快就回来。”

我刚到北京几个小时，周总理就这样亲切地同我谈工作，增强了我的信心和决心。但是想想中央工作范围那么大，头绪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责任那么重，我顿时有了一种“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感觉。

从中南海回京西宾馆的路上，我把我的感觉同秘书说了一下，他也觉得到了北京连接个电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我说我们要很好地学习、锻炼。我的想法是要向毛主席、周总理学习，要在实践中锻炼。我暗自定了一条宗旨，就是要坚持边学习，边工作，边锻炼，边提高。

我的学习愿望很快实现了。到京不久，周总理通知我说，毛主席要见我。我很高兴，随他一起，到毛主席那里去。

我同周总理来到毛主席住处，进了室内，周总理说：“主席，德生同志来了。”毛主席抬起头，我向他行了军礼，只见毛主席身着一身半旧的浅黄色睡衣，坐在沙发上。伟人的神态和气质，使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放下手里的书，同我握手，然后拍拍身边的沙发，要我坐在他的身边。我坐下来，环视一下室内，看到摆设简朴，除了半圈沙发、茶几，后面放着书柜，装满了书籍，有好多线装书。桌上、茶几上也有一些打开的书，或夹了纸条的书。这是我第一次受到了主席单独接见，心情有些紧张。大概是毛主席看到我拘谨的样子，

随手拿起周总理放在桌上的老花镜戴了一下，问我：“你是不是也要戴眼镜了呀？”

我没想到毛主席第一句话不问工作，不问经历，而是问的一个生活小事，心情放松下来，比较自然地回答说：“看书的时候，也要戴花镜了。”

毛主席对我说：“你是 12 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他的话使我很吃惊，我原先以为，他之所以了解我，大概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几件安徽制止武斗、促进联合的事，因为平息芜湖武斗的事件，是他批转全国的。想不到他这么周到地了解一个干部。像我这样一个军长、省革委会主任，全国有多少啊！接着，他又问我安徽的一些工作情况，偶尔还说一些安徽史地典故和历史名人。周总理有时也插话谈对安徽形势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对安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我这个革委会主任少。似乎不是我在向他们汇报情况，而是我们共同谈论安徽工作。

这是我到中央工作后，第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等着他对我到中央工作后提出具体要求。然而，毛主席思路纵横驰骋，完全不像我想象的常规的工作方法。他谈起了党在历史上同左右倾路线斗争的情况，又问我平常爱读什么书。我看到毛主席房间里那么多书，顿感惭愧。我说：“主席，我文化程度不高，除了学文化，就是读一些军事理论方面的书。”他说：“你打了好多仗，但是光读军事书籍不行，还应该读点历史、文艺、科技方面的书。你看过《红楼梦》吧？”

我只好如实地回答说：“看过，只是断断续续的，没有从

头到尾完整地看一遍。”

毛主席说：“要读《红楼梦》，要把它当历史读。我是读了5遍才能开讲的。”谈到学历史，他又提出，《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5遍。”这是我第一次听主席谈历史，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常常听到他旁征博引，讲了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的故事，讲汉王刘邦和吕后的故事，讲灌婴和周勃的故事，评说范文澜和郭沫若的历史著作之得失。他讲这些典故，我总感觉他是有感而发，是有着具体的或广泛意义上的针对性的。有一次，他问我北京为什么叫燕京，问我北京最早居民点在哪里。这是我当了北京军区司令员以后的事了。”

周总理向毛主席谈了对我的工作安排。我说：“我感到职务太多，担子太重，担心干不下来，安徽省和南京军区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免掉。”毛主席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总理鼓励我说：“德生同志，就按主席的指示，大胆地工作。”主席又一次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毛主席这番谈话，是我事先怎么也料想不到的。过去我听传达说，毛主席集中讲某一个问题时，爱引用“不唱天，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毛主席对我不谈工作任务，不谈工作要求，只谈一个学习问题。我感到对我这个从军长岗位上刚到中央工作的人来说，真是特别重要。他鼓励我向书

本学习，向历史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他不免我安徽的职务，也是便于我到基层调查，在实践中提高啊。我领悟到，在中央工作不能只想到如何工作，如何克服困难，而应该努力学习，这样才能使自己视野广阔，思路清晰，不至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束缚。后来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这恰恰是在中央工作最重要的条件。

自此以后，我是努力按照毛主席“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做的。很长时间，我请总政宣传部一位同志给我辅导讲解《通鉴纪事本末》。以史为鉴，对现实斗争中的某些问题，往往会有有一种更深的感触，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简单对号，穿凿附会，也会走人歧途。我体会，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去指导实践，运用之妙，是门艺术，是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把握好的一门艺术。

1971年我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之后，毛主席又要我学习地理，推荐我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他要我先读有关华北部分。这部书史地结合，“史其方輿之向导，方輿其史之图籍”，它既描述了地形特点，又介绍了历史战例，我们译注后发给部队，对于加强华北地区战备工作，确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这期间，我请人作辅导，学历史，后来在批林批孔中，总政有人贴大字报，说我学这些知识是想当皇帝。这真是怪事。不过在“文革”左的思潮盛行的年代里出现这种随便联系，随便上纲的事太多了，也不奇怪。

我在北京工作4年，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听毛主席讲话，也曾多次被他召见，交代工作，汇报情况。给我留下最深的

印象之一，还是他谈学习。他那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见解，博大的胸怀，使我深受教育。

我们见毛主席，机会毕竟还是比较少。而周总理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主持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接触的机会就多了，有时几乎每天都要在会上见面。他日理万机，我是通过他的实践，通过他对工作的布置和指导，体验和学习他那睿智智慧、严谨缜密、从容镇静、平易近人的作风，以及学习他善于处理国际国内事务的高超艺术。

回过头来说我请假回安徽后，把全省重大工作作了部署和交代，要求省委的同志加强集体领导，大胆抓工作，重大问题及时与我联系，又到一些地市检查了工作。9月底，我回到北京，开始了在中央的工作，即开始边学习、边调研、边工作的实践。我那时活动的顺序是：首先参加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军委办事组。

我到中央工作后，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解决一些省、市包括有些地区如河北保定地区、浙江温州的问题。这些地区派性闹的都很厉害，省里解决不了，只好到中央来解决。到会的有军队的同志，有地方干部，也有群众组织代表。真是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使我大开眼界。我体验到周总理分析各种人，做各种人工作的本领，既耐心细致，又是非分明；既热情开导，又严肃批评，真使我钦佩不已。我过去在部队工作，即使在安徽做群众工作，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类型的人物，没有做过这么多类型人的工作。几次会议之后，可真长了见识，长了学问啊！

我还随同李先念同志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

和罗马尼亚，后来又同李先念同志到越南参加胡志明同志葬礼，单独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访问朝鲜。几次出访使我积累了对外事活动的一些知识。

就是在1969年12月与李先念同志出访阿尔巴尼亚后，中央让我留在新疆，作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我在天山南北跑了一些地方，到了许多边防哨卡。使我了解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少情况，以及边防工作的现状。我把我的调查，也可以说是学习的收获，向中央写了报告，国务院还专门听了我的汇报，会后调拨了北京吉普和一些物资器材，解决边防部队急迫解决的实际困难。

我到中央工作后，学习体会最深的地方，是在国务院业务组。

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那是在特殊情况下成立的总理工作班子。由于“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等人篡夺了党和国家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国务院的许多部委领导被批斗，工作无法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周总理忧心如焚，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他提出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建议成立一个中央的业务组，专门抓全国各条战线的生产，这个建议得到通过。这才有了国务院业务组，担负起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业务组成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谢富治、杨成武、余秋里、谷牧等，不久，陈云、李富春等同志被迫停止了工作，我到业务组的时候，经常参加会的只有周总理、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纪登奎同志是和我同时进业务组的，到1971年增加了华国锋同志。

国务院业务组成立后，各省市自治区也仿效这一做法，成立了专门抓生产的班子，大多叫生产指挥组，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组织指挥生产。国务院业务组一直到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之后，才告结束。近8年时间，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履行国务院基本职责的历史任务。

我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时，上了“实事求是”、“艰苦朴素”精神的第一课。国务院会议厅，在中南海北区一个小院内，是老式四合院，面积很小。据说五十年代有人曾建议改建或扩建一下，周总理不同意，后来又有人建议盖政府大楼，周总理坚决不赞成。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直是国务院举行会议的地方。我走进正厅，只见中间大厅放着几排桌椅。中间是总理的座位，总理面前的长会议桌两侧，是业务组成员们的座位，后边一两排桌椅，则是列席会议的有关部长和工作人员的座席。靠门口的两侧，挂了两块木扁，一块写着“实事求是”，一块写着“艰苦朴素”，都是毛主席的手写体。整个室内很朴素，看得出已有多年没有粉刷装修了，但是却很整洁。这就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中央政府的议事厅。

国务院业务组开会，我曾参加讨论的大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国务院机构的调整，精简整编，小到一些具体事项，事先都有明确议题，重要的事情还在会前印发了有关文件。周总理主持会议，总是开门见山请有关的同志简明扼要地介绍有关情况，需要解决的问题，设想出几种解决方案。涉及到几个部委的事，则各自讲述自己

的情况和意见。在这样有情况、有依据、有解决办法的讨论过程中，周总理经常插话，或者提出一些问题，听取多方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的同志，都很兢兢业业，会前精心准备，会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议事共事的气氛很融洽。这时，我总看一看墙上那“实事求是”的匾额，我觉得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感受周总理培养起来的这种遇事和大家商量，发扬民主，倾听意见，服从真理的科学态度和优良作风，好像住了学校，是我熟悉情况的过程，更是向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学习的过程。

至于“艰苦朴素”，不仅体现在业务组处理大事时，为国民计民生精打细算，而且处处都体现得一丝不苟。我们这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国务院总理的议政大厅，除了安装了暖气、冷风，几乎没有什么装修。到会的同志，一杯白水，要喝茶，有包好的茶叶，两角钱一包，自己掏钱买。除夜餐外，平时吃饭记帐，每月结帐交款。夜餐也坚持5角钱的标准，有时一碗面条，有时几只包子，一碗小米稀粥，从不超过标准。这就是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从国家大事到生活小事，都体现了周总理的廉政作风。在这个环境里工作，怎能不是最好的学校呢。

我刚参加国务院业务组时，没有分管专门工作。时隔不久，周总理提出，让我协助他分管水电部的工作。他说，建国以来，有两件事是他非常关注的，其中的一件就是水利。这时，我对全国工农业生产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又从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身上学到了他们处理问题好的思想、

作风、方法，尽管让我具体抓工作还很没有把握，但是看到总理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确实不该推辞。而且这个部门是周总理直接管的，有事可以直接请示他。心想只要自己能做的一定努力去做，没有把握的再请教总理。

当时主持水电部工作的副部长钱正英同志听说我分管他们部的工作，主动找我汇报情况。她是位著名的水利专家，是位女中豪杰，穿一身布制服，脚上常常穿一双胶底力士鞋，显得很精干。她对全国水利建设的情况非常熟悉，谈起工作中的情况来具体明了，在许多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而且经常辩证地阐述有关水利建设的方案，让你很快就对全国水电形势有个清晰的了解。用军队的话来说，是能很快进入情况。我暗自感叹，强将手下无弱兵，周总理选用的干部，几乎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专长，又都体现了周总理那种办事认真、周到、高效、严谨的作风。后来在张文碧部长、钱正英、杜兴桓副部长等具体筹划下，召开了有关省市领导参加的治淮工作的会议，讨论了进一步治理淮河的规划和部署。在这之后，还专门研究了发展小水电事业的设想和具体措施。

我分管水电部工作时，正是葛洲坝工程紧张的筹建时期，这是毛主席十分重视，周总理亲自组织实施的全国重点建设项目，是当时水电部的中心工作。我参加过多次关于葛洲坝考察情况的汇报会，葛洲坝工程设计的论证会。我努力学习国务院业务组的作风，把方方面面的情况搞详细，搞准确，各方面的意见都能讲出来，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搞清楚，为国务院拟定葛洲坝建设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周总理要求我们，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水电战线的专家与工

程技术人员，兢兢业业，周密组织，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务必保证葛洲坝工程按期上马。1970年12月25日，经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反复审议，并报毛主席批准，葛洲坝水利工程枢纽建设正式开工。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我们组织全国第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开赴工地。他多次对我说，水利工程是同水打交道的，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一马虎就要出大乱子。要吸取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的教训，解决好大坝建成后可能出现的水从两山泄漏和积沙问题。对这两大问题，尽管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作过多次专门研究，已经选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总理还是反复强调，从设计方案到组织实施有个实践过程。在实施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疏忽，明确严格的技术鉴定和把关责任制，并且要为今后的水利建设，摸索和创造解决这方面问题的经验。按照总理的指示，我和钱正英等水电部领导同志做了具体布置和抓好落实。周总理还要求我们关心施工人员的吃饭、睡觉和安全问题等等，并且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直到1972年他还抱病出席在京召开的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会。

1981年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我从电视里看到那宏伟的大坝，屹立在长江宽阔的水面上，气势恢宏，不由得想起周总理为葛洲坝建设所付出的心血。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这段时间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为了使国家日常活动得以正常运转，使人民衣食住行得到切实保障，周总理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啊；也使我体验到周总理以及许多忠于党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干部，

为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所作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周总理在处理个人问题上，同样使我深受教育。他的侄女周秉建，随知青到内蒙插队锻炼，后来参军在内蒙军区。总理得知后，坚决要求她仍回原生产队锻炼。开始我想，年轻人愿意到部队当兵受教育，不算过分，我劝说总理不要变动了。周总理不但没有采纳我的意见，反而做我的工作，他说，我的亲属可以离开农村到部队，广大知青怎么办？不能搞特殊，而且要邓颖超同志多次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要我按总理的意见办理。周总理对别人的事，却关怀备至。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给总理写信，提出孙中山先生一个老部下的孩子，想到总政直属文艺单位工作。周总理接信后，立即批示让我办理，并说，宋庆龄同志极少提个人的事，望能给予关照解决，从速办理此事。我在办理过程中，他还多次过问此事，直到这个孩子从上海接到北京排就绪，向总理报告后，他才放下心来，还让我当即向宋庆龄同志汇报。

## 初次接触高层的斗争

我初到中央工作时，对上层的情况不那么了解，对有些问题看得比较简单，总认为，九大开过了，提出了团结、胜利的路线，今后，就是团结一致去努力工作。渐渐地，我觉察到，事情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在中央领导层的内部，还是有差异、有矛盾的。这个差异和矛盾，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人同你讲，要靠自己去体察、去思考。有差异、有矛盾，

符合毛主席的《矛盾论》，并不奇怪。许多矛盾是可以通过工作，达到新的团结和统一的。但是有的矛盾，你一下子还弄不清它的全貌，处理这种发展、变化中的矛盾，难度可就大多了。

事情的原委要从我参加军委办事组说起。我到北京，开始住在京西宾馆，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住在西山。军委办事组办公地点也在这两个地方。当时军委办事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成员还有李作鹏、邱会作等，他们是经常参加活动的。我参加军委办事组活动一段时间后，就觉得同国务院业务组很不一样。讨论的议题事先不早早地告诉你，也很少印讨论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代的，但又不具体传达他的意见。讨论问题的时候，好像他们已经商量过了，由他们一两个人谈了意见，大家就不再发言了。在这种环境中参加决定问题，批办文件，是很难办的。他们在会前会后，往往在一起谈四野的历史，谈“文革”中你争我斗的故事，或者练习书法，不同你交流情况。他们过去职务比我高，我对他们是尊重的，可我隐隐约约觉得他们好像戒备我什么，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开始提名军委办事组人员时并没有我，是毛主席在审定名单时，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后来叶剑英副主席把批示原件给我看，我才知道这个过程。

我参加军委办事组工作，当时按政治局的意见，分工我管军队政治工作，并着手恢复总政治部的工作。

总政治部是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建国以后第一任主任是罗荣桓元帅。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陆续提

出。“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左”的东西，罗荣桓同志对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做法曾进行过抵制。“文革”开始后，总政在军委几位老师的领导下，采取谨慎稳妥的措施指导军队系统的运动，保持军队的稳定，林彪、江青对这些很不满意。

1967年1月，陈伯达、江青支持总政治部内部造反；1月17日林彪写信支持解放军报社造反派，要他们“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5月，林彪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违反周总理提出军队文艺团体两派要联合演出的要求，支持一派演出，挑起武斗事件，诬陷总政领导是黑后台。到了7月25日，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提出：“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从此，总政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梁必业、徐立清、袁子钦、傅钟同志被扣上“阎王”的帽子，正副部长被诬为“判官”，正副处长被诬为“牛头马面”，一些干事也成了“小鬼”。使全军政治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总政治部从此瘫痪。他们甚至在1968年10月，派出军管小组，对总政治部实施“军事管制”，演出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林彪、黄、吴、李、邱，要沿着“砸烂阎王殿”的路子，要在全军继续推行他那条所谓“突出政治”的军事路线；甚至要通过总政，影响“三支两军”人员于预地方的工作。而毛主席在实际上是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总政恢复办公后，总人数不能超过200人，当前主要做好“承办、批转”工作。任命我为总政治部主任，听说在我到北京来之

前政治局就讨论过，当时谢富治曾表示不同意，说：他是个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毛主席当面批评了他。我的任命命令，直到1970年4月30日才公布。

我负责总政恢复办公的筹备工作，当时已经任命黄志勇、田维新两同志为总政副主任，我们经过两个多月筹备，于1969年12月完成。当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出‘厂新年春节拥政爱民的通知，公开见报，实际上宣告了总政治部恢复办公。总政机关人员的组成，我们大体卜按原总政机关选五分之一，原军委办事组政工组选五分之一，各大军区军兵种机关选五分之一，军师机关和团营各选五分之一的比例选调干部。正副部长人选大都是各大单位推荐选拔，共13人，他们是：秘书长工迪康、副秘书长肖麦萍，组织部长李宝奇、副部长孙子斌，干部部长魏伯亭、副部长王如炎，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翟鸣武、刘永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群工部部长吕村夫、副部长李平。后来发现没有西北地区的，又从新疆军区调采宋英奇同志任群工部副部长。毛主席、党中央历来强调，高级领导机关配备干部，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不要搞团团伙伙，我看这一条非常重要。总政机关编199人，既包括主任、副主任，又包括四个打字员，分成一个室（办公室）、五个部（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群工），而且员额还未调满。当然这样一个机构，要担负起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职能，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比较精干，不会出现机构庞杂，陷于自我服务的困境。同时还由于军以下单位选来的干

部多，他们没有搞过“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北京一些机关和群众组织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按照军委指示，派到驻京单位的观察组、工作组，就比较超脱，没有陷入派性中去。

总政机关干部调齐后，从1970年元旦起，我们先传达学习毛主席关于总政工作的指示。这时，由军委办事组直接领导的总政军管小组的一个负责人给我送来几大本所谓总政阎王殿的罪行材料，让我们作为“大批判开路”之用。我在很小范围内组织几个同志花了几天时间阅读研究，觉得完全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地方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按这套材料开路，今后总政工作方向就很难把握了。于是，这份材料既没有退给军管小组，又没有让大家批判，而是把它压了下来，至今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后，我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精神，要求大家组织好学习；有计划地下部队调查研究；工作上不能随意向下面发指示，不经研究报批，不得随便答复下面请示的问题；加强部办公会议的集体办公制度。

这种工作方法，今天看来，有的不一定完全合适，但在当时那种特殊情况下，确使总政机关少出差错。

我们按毛主席的要求，组织了精干的总政机关，把自己的工作，按照当时的形势，只限制在承办批转范围内。没有对过去总政的工作搞大批判，全盘否定，没有大张旗鼓去宣传贯彻林彪那一套。我以为，这是符合毛主席多次同我谈总政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的要求的。

就在我的任命命令公布不久，1970年5月19日下午，

我们突然接到林彪办公室通知，说是林彪要接见总政正副主任和二级部长。当我们到了毛家湾林彪住地时，黄永胜、吴法宪早到了。

林彪说，他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一贯对政治有兴趣，主持军委工作十几年，重视的还是政治，是政治工作的内行。他说，全部工作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而活学活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都是搞政治。他又说他是搞政治第一，而别的军委领导同志搞技术第一，说是很多问题不找他，不走正道，不走合法的组织路线。说过去总政保卫部有人专了他的政。他甚至暗示，我当总政主任，是他选的，是他要找一个军事干部管政治，找一个丘八管秀才。黄永胜、吴法宪、叶群也一旁帮腔吹捧。

当时我想，作为军委副主席，接见总政干部，讲讲话，这是正常的事，我们对他还是很敬重的，对他的讲话，我们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只是感到他对总政的要求，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也可能是因为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讲的多一点。对于这些差异，不敏感不行，过敏了也不行。但是，至少有一点我觉得不对头，就是我当总政主任，半年前，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毛主席、周总理就同我谈过，讲的是很明确的，对我的了解是很具体的，怎么成了他选的呢？

这是林彪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接见我和总政干部。

林彪在接见中，还一再讲到用突出政治去支左的问题。这也同当时毛主席要解决军队支左干部骄傲、要逐步收回支左的干部的想法不一样。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在看到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

情况报告》中，提出“三破三立”，即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世界观；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立新功的思想，立即指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请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他要求“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这个批件，很快就送到总政治部来办理。当时大家感到这是毛主席对总政治部的信任和期望，总政治部以军委总政治部的名义出现，已经是多年没有过的了，而且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联名发通知，也是少见的。我们连夜讨论起草了通知稿，经过周总理修改，毛主席审批“照发”，于1月11日发出。这一文件对军队政治工作，对于军队的批陈整风运动起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使我感到矛盾和斗争更为明显的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刘少奇同志被“打倒”以后，国家主席就空缺了。

1970年3月8日，毛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3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4月11日，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主席再任国家主席。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报告。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毛主席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他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当时我在会上听了毛主席再三申明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当国家主席的讲话，而且把话说到了不要逼他就范的程度，觉得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办了。但是林彪根本不听毛主席的话，要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了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他认为，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当时，总政治部负责汇集全军讨论宪法修改意见。我们已经按中央的要求，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所以在汇集意见时，注意反映部队拥护毛主席意见的意见。而主张设国家主席，不仅林彪他们在会上一再坚持，而且在他们控制很严的，某些单位的报告中，赞同设国家主席的理由，也几乎是差不多的。

1970年春夏，几次讨论宪法草案时，意见总是对立的，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了，矛盾不是通过工作得到化解，而是交锋之后反而加深。处于这一场斗争中，我只有按照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办事，即使有什么差错，也是错在明处。我除了参加正式会议，不随便到处走动，除了发给的文件，不随便打听消息，除了按原则办事，不随便说话批东西。这样做也符合我的性格，我从来不搞那些拉拉扯扯的事情。

总政恢复办公半年时间内，没有批判“阎王殿”，没有大肆宣传林彪“五·一九”讲话，又在讨论宪法草案时没有突

出反映设国家主席的意见，这在我们来说，是谨慎地按组织原则、政治原则办事，唯恐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触犯了林彪。后来才想通，这就是我在军委办事组受冷落的原因。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过程：军委办事组开始酝酿名单时没有我，是毛主席加上，还有李德生；后来他们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发“论天才”的语录又不给我，军委办事组犯错误，毛主席又指出李德生除外。这个一内一外，耐人寻味。

## 庐山的较量

林彪、黄、吴、叶、李、邱在修改宪法问题上存在的不同意见，不仅没有经过政治局会议的多次讨论得到统一，反而于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时，竟然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3天工夫，又不堪一击地退却收场。

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我正在安徽搞调查研究。我是7月下旬请假回安徽的。先后到皖北、皖中视察，研究解决如何改变贫困面貌，搞好工农业生产的问题。8月15日我到六安当晚，接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打来电话，问我，到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是回北京后再去，还是直接从安徽去。我告诉他，直接从安徽到庐山参加会议。8月16日到18日，我到安庆视察工作后，在安庆主持了省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对筹备召开第三届省党代会及抓好工农业生产等工作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8月19日，我和在安徽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郭宏杰、李定山，一起从安庆空军机场乘飞机前往九江，换乘汽车上了庐山。

到了庐山后，我被安排住在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住地。周总理住在这组房子的主楼。主楼后面山坡上三五十米处有几幢小楼，我住第一幢，上面是李先念同志，再上面是余秋里同志。每天吃饭，都在一起。

林彪同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住的比较靠近。隔我们有三里多地。会前我曾到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住地，一起见了一下面。

8月22日晚上，我参加了政治局会议，这是九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毛主席提出：要开成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会上，林彪、陈伯达再次提出设国家主席和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会议研究确定了会议日程和编组名单。我编入华东大组，许世友同志为大会召集人，又按省分小组，我是安徽小组召集人。安徽小组连我才3人。23日上午，我向安徽的郭宏杰、李定山同志传达了会议议程安排。

8月23日下午3点，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会堂举行开幕式。毛主席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宣布了会议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问题；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讨论战备问题。

按宣布的程序，下面应是康生报告宪法的修改经过，可是这时林彪讲话了。虽然会议程序中没有这一项，但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当时主席台上政治局的几位常委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都在座，大家还以为是预先安排林彪讲话

的。

林彪一开始就讲：“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指示。”大家听了这样的开场白，几乎都以为是常委研究决定林彪发言的。

林彪当时的讲话没有印发稿子，对他的这篇讲话不可能全部都记住，但对他的一些重要意思是听清楚了。林彪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大加“颂扬”，他特别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接着，他指责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沉思。”对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因为受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没有敢直截了当地亮出他的底牌，而是说：“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用“国家元首”这个词来作伏笔。

当时，大家并没有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因此，反映也不强烈。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的会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第二天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学习林彪讲话，得到了政治局的同意。

第二天，24日，各组讨论林彪讲话，就出现了问题，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林彪一伙按他们事先策划密商好的口径，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他们的共同点是要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并说，谁要是反对这两条，谁就是反革命。

吴法宪在西南组会上和张春桥大吵起来了。

为什么林彪再三坚持设国家主席，并且要在中央全会上挑起一场争论呢？据“九·一三”后，1971年10月21日吴法宪亲笔交代：1970年7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为了配合这次搞突然袭击，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发起进攻，陈伯达、叶群早在8月中旬就作了准备，上庐山后，他们又急急忙忙拼凑了一些语录，经陈伯达审定后，连夜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了一些人。军委办事组好多人都有，就没有发给我。

林彪讲话后的第二天，除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煽风点火外，陈伯达在华北组作了一个比林彪讲话更为露骨的发言。其中讲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写进宪法“是经过很多斗争的”；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人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想搞历史的翻案”、“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陈伯达的发言，作为华北组2号简报（会议总编号6号），25日一早，发到了与会者手上。陈伯达作为中央常委讲这番话是很有煽动性的。

24日因许世友同志有事，华东组没有进行讨论。晚上我和李先念、余秋里等国务院业务组的同志，在余秋里同志住处继续讨论修改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所以当时并不知道他们在几个大组煽风点火的情况。25日上午10点左右，秘书

神色有些紧张地给我送来了会议 6 号简报。因为他看到陈伯达发言中措词激烈，不同寻常，简报说对反对毛主席为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秘书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急忙送来了。

我马上将简报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两遍。我从来极少抽烟，这时，不知不觉地拿出烟筒里的香烟，狠狠地抽了起来。对当时会上出现的问题，使我引起了很多思考，深深感到情况严重，斗争复杂，这是我到中央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严峻的局面，而且许多问题使人迷惑不解。比如：林彪为什么要一直坚持设国家主席；陈伯达为什么如此有恃无恐地带头发难；陈伯达同张春桥过去常叫战斗在一起，现在又剑拔弩张，势不两立；这场矛盾和斗争的根源何在？究竟是什么性质？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联想起毛主席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话，这可能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当时我想，面对这样复杂的斗争现实，最要紧的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要光明磊落，要按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办事；不能随意表态，不要跟着起哄，不要介入非组织活动。不管碰上谁来打与拉，都不动摇。不久，事情真相大白。

8 月 25 日下午，毛主席紧急召开了由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 2 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的方针的。

毛主席严厉地指出：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开。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还曾把手放在许世友同志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只能在后台，不能在前台，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当国家主席。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精神传达后，形势急转直下，大家终于明白了这场来势凶猛的风波，绝非偶然。

8月26日晚开始，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参加了会议，记得是在毛主席住地，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开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作检讨，周总理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林彪还为陈伯达辩护、开脱。会议虽然只是批评陈伯达等人，但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林彪明显不满。他说过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是一方面军的，可是我身边没有一方面军的人；我是湖南的，我身边没有湖南人，他还批评了“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当时我就想，这不是指的林彪重用黄、吴、李、邱，搞自己的山头吗？

28日上午，全会继续进行，以大组为单位，听取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录音。这个录音放了两遍，大家完全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和斗争的性质。

29日上午，周总理通知我和李先念同志第二天下山，回北京替换纪登奎、黄永胜，担任中央值班，让他们上山开会。原定吴法宪下山接替黄永胜，因吴法宪在会上出了问题，改

由我下山替换黄永胜。我和李先念同志在周总理住处接受任务，直到吃过午饭才回来。下午作下山准备工作，我交代安徽的两位同志，按中央的指示，开好会。

30日清晨，临行前，我又去见周总理，问他有什么指示。那时天还没大亮，他正在餐厅吃早饭，我坐在他对面，听他指示。

周总理说，李先念同志回北京是主持国务院工作，你回去接替黄永胜，主持军委的事。

周总理还问起华东组讨论情况，我作了汇报。

周部理说，林彪先发言他没想到。华北组陈伯达搞的简报是突然袭击。要我回北京换黄永胜是让黄来参加会。

周总理的谈话，使我知道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是没有经过常委的，要搞突然袭击，我对庐山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更加清楚了。

随后，我和李先念同志乘汽车到九江，不久飞机来了，纪登奎、黄永胜下了飞机，我们就乘那架飞机返回北京。

回北京后，山上的情况是后来知道的。9月1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一开始就谈到那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谈到所选列宁第五条语录中关于“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时写道：“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

心吧，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主席经过几天调查研究，掌握了多方面知识，看清了庐山的这场风波的实质，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出事件性质，公开批判陈伯达，统一全党思想，但对林彪还是采取“保”的态度，给他以觉悟的机会，全会转入批陈，接着继续完成了预定议程。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于1970年9月6日闭幕，为了斗争形势的需要，和进一步查清问题，公报只字未提庐山这一场激烈的斗争，而且公报最后的口号仍然是“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九届二中全会看，林彪一伙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地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事日程，说明他们的能量不小。毛主席对这一问题做过非常严肃的思考。林彪到底还进行了些什么活动？还有些什么人卷进

他的圈子？都需要进一步查清，在庐山时间很短，不可能在会上搞清林彪的问题。

会议后期，周总理回北京参加一项重要的外事活动，通知我一个人去机场接他，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我到机场迎接时，总理下了飞机就对我说：德生同志你看一下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庐山的问题就全明白了。我还亲手交给我一包材料，要我回去仔细看。这是庐山会议后期斗争情况的记录。

我从机场回来，阅读周总理交给我的材料，我眼前浮现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上的表演。他们有的赤膊上阵，有的不阴不阳，有的引经据典，有的直言不讳，时而紧锣密鼓，时而偃旗收兵。透过他们的表面现象，我感觉到在他们背后，似乎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认为，目标、利益一致的矛盾，是可以通过讨论、批评得到解决，走上团结统一的。目标、利益根本对立的矛盾，是很难通过党内斗争的方法统一起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还要调查，还要看发展。

不久，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从继续批判陈伯达入手，开展批陈整风。中央组成了周总理、康生和我参加的3人小组，负责清查陈伯达的问题，并另请叶剑英同志负责到福建作调查。

庐山会议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写书面检查。

## 山雨欲来

有个时期，毛主席分析国际形势时，爱用“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名句。可以说，从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到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这一年时间里，我们党内的斗争，也是一个山雨欲来的形势。

毛主席认为，庐山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路线斗争。一方面，他提出，“对林彪还是要保”；另一方面，又认为，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他还表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他是抓住不放的，是不让步的。而林彪在庐山会议阴谋败露之后，一直不检讨认错，因为他是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怎么能作检讨呢，只要退一步他就会全线崩溃，全军覆没。双方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生死较量。

在这山雨欲来形势下，我仿佛置身于三江交汇的激流之中。我参加三人小组，但是审查陈伯达，绕不过林彪的问题。我在军委办事组，要贯彻九届二中全会精神，但是还要同黄、吴、李、邱共事。“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而我所面临的不只有惊涛骇浪，还有急流暗礁。正是：斗争未有穷期，贵在坚持原则。

在庐山会议之后，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庐山的事作出书面检查。他们在1970年9、10月和1971年3月，先后

写了检查。

毛主席看了他们的检查后，多次作了批评。1970年10月14日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10月15日，毛主席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这最后一段讲政策的话，是毛主席当时的指导思想，是要让他们认识错误。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对“文化大革命”的消极方面和个人崇拜现象作了分析，并且说：“什么‘四个伟大’（即林彪提出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这个谈话，在一定范围内作了传达，明显批评了林彪。

与此同时，毛主席很气愤地指出：你们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不取下来，我再也不进人民大会堂。并指定要我办理此事。我在周总理的指导下，与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共同办理妥当，事后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后来，我建议京西宾馆也仿照人民大会堂的作法，全部取下了毛主

席语录。

1970年12月下旬，我经请示周总理同意，回到安徽检查工作，并准备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部署1971年工作任务。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我立即回北京，毛主席要找我谈话。我改变了原定的活动计划，第二天乘中央派来的飞机，从合肥返回北京。下了飞机，直接乘车到了毛主席住处——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简要地问了我去安徽的活动情况后，就说：“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当司令员。当时我听了心里一愣，现在我担任的职务已经够多的了，而且一个也不让免，再管一个大军区的工作，精力顾不过来，弄得不好，哪一项工作也做不好，过去也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兼那么多职的。因为与毛主席接触次数多了，与他交谈时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我就向他提出：

总政的事还管不管？

毛主席非常干脆地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

他再一次重申，总政主要是搞好“承办批转”。毛主席还向我具体地谈了总政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届总政主任的情况。最后，毛主席说：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就到职上任。

当天，我回到总政机关的办公室不久，中央办公厅就送来了“毛主席对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请示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是：

“照办”。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

纪登奎二位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这里所说的两个包袱是指当时在部队中存在的“打仗有功”、“三支两军有功”的骄傲情绪。）

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中央召开了华北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陈伯达。此时，军委召开座谈会，但是开了一个月，既不批陈，黄、吴、叶、李、邱也不作检讨，于是将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00多人全部参加华北会议。华北会议本来没有江青的事，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也没有指派她参加会议活动。有一天，她跑去在大会上发言，主要不是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是大讲特讲华北山头主义，引起了与会者的反感和不满。

1月24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对会议作了总结讲话，系统地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对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作了部署。并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经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1972年10月为第一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华北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行批评教育，责成他们作出深刻检讨。同时，中央准备在4月份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1971年3月下旬，按照毛主席要挽救林彪的精神，周总理带领我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

向这位副主席汇报批陈整风的情况，转达毛主席的意见，希望他在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讲几句话。我坐在一边，听周总理严肃而又动情的谈话，为之感动。我仔细看着林彪面孔，他那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他心里究竟怎么想。最后，他不温不火地对黄、吴、李、邱说，错了要好好检讨。一句也不讲自己有什么错误，有什么责任。他还讲他的身体不好，明显不愿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当时哪里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儿子林立果，正在上海密谋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谈话冷场，周总理起身告辞。

回到北京，周总理立即带着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主席听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肃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可以明显地看出，毛主席对林彪的态度，是非常不满意的。

1971年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汇报交流了批陈整风的经验，进一步揭发了陈伯达的罪行，系统批判了陈伯达一伙在庐山散布的种种谎言。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在黄、吴、叶、邱书面检讨上的批示，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帮助，指出他们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要求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要解决一些地区的团结问题。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张春桥等人插手浙江，南京军区和浙江的主要领导之间，长期关系比较紧张。会议期间，毛主席要我做做他们的工作。在京西宾馆，我先

向许世友同志转达了毛主席请他抓一下浙江的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团结问题，许听了很高兴，表示不管多么困难，一定要按毛主席指示去办。同时，他诚恳地说，过去不是没有看出这两方面的问题，而是为了避嫌，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是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愿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他接着表示希望我同浙江的同志也谈一下。我又找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革委会副主任、20军军长熊应堂，分别转达了毛主席指示和许世友同志的态度，他们听了表示很受感动，欢迎许世友同志来抓浙江问题，认为先解决好军队的团结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地方的问题。许世友同志的谈话很诚恳，我们都知道，他对张春桥等人在“文革”中的恶劣表现，非常不满，而且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有时当面批评张春桥，义正词严。张春桥对他又怕又恨。许世友同志的谈话讲得很坦率，他所说到避嫌的两条理由中，两个“别人”，明显是指张春桥。他不怕困难，不再避嫌，我也不应当避嫌！我和他们三人谈话已到深夜，一回来就写报告，我把许世友同志谈到避嫌的两条理由，以及他们三人的态度，如实地报告毛主席。我的报告于4月24日凌晨5点送出，隔两个小时，早上7点钟，中央办公厅就送来了毛主席的批示。毛主席在我的报告上批道：“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这就是“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这句名言的出处。后来，成为解决一些地区和单位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时，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的总结讲话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周总理指出：“对同志间的不同意见，有些隔阂，大家都应当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顾全大局，不计较小事。主席说：‘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帮助解决问题的人，不应当避嫌，当事人也不应当避嫌。主席指示的办法有两条，‘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总之，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

从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至1971年4月批陈整风汇报会，历时7个多月，林彪对庐山他带头掀起的这场政治风波，不作任何检讨。毛主席多次给机会让他下台阶，他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在反革命的道路越走越远。从我们在林彪叛逃以后查获的他的罪行材料证明，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直接指挥着加紧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活动。

吴法宪为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活动，抓紧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他将参军仅两年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提升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在空军党委会上非法授予林立果对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特权；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利用职权网罗一批骨干分子，组成代号为“联合舰队”的反革命别动队，成为林彪准备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核心组织。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按照林彪的旨意，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研究制定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紧接着召开了有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江腾蛟、上海空4军原政委王维国、杭州空5军原政委陈励耘、

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

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期间，林立果、周宇驰一伙在上海秘密据点，讨论斗争形势，认为林彪已失去毛主席的信任，“与其束手就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上先发制人”。他们“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展开了一系列阴谋暗害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活动。

毛主席从大量揭发掌握的材料判明，同林彪的这场斗争远没有结束，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毛主席在北京对中央政治局的成员，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不断打招呼；1971年8月中旬，他决定外出到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掌握情况，并为准备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造舆论。

同时，毛主席指派周总理，率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于1971年8月16日再次去北戴河会见林彪（此时，我率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向林彪通报，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展开。

听说即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林彪一伙惶惶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位置难保。

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对沿途各地负责人反复打招呼，指出庐山这场斗争，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点出这场斗争的

性质和实质，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他通过讲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要求大家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同时，也严肃地警告林彪一伙，“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毛主席巡视南方，一次次挫败了林彪一伙策划的谋害计划，化险为夷，9月12日返回北京的途中，要汪东兴同志通知我和纪登奎、吴德、吴忠同志到丰台车站，找我们谈话。这天中午，我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丰台，下午1点多钟，我们4人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见到毛主席，当时汪东兴同志也在场。据说，毛主席出巡，白天返京，在丰台站停车，是极少的。

毛主席长途南巡，虽然一路疲劳，而且思考着处理林彪集团的大事。但是我看他精神很好，和往常一样，谈话十分风趣幽默。他先问了我日前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问及他们对尼克松访华问题的反映，我讲了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后，毛主席笑着说：“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随即转到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

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后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5个常委瞒着3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9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讲了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还说庐山的事还没有完结，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

这时毛主席掉过脸对着我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问他们要，一年要三次，‘你们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指的是林彪他们不发“天才论语录”给我的事。在庐山，他就了解到这一情况，毛主席当时就对我说：“你向他们要呀！”这次又重提此事，我领会是毛主席再一次提醒我，同林彪他们的斗争还没有完。

最后，毛主席单独向我交待一项任务，从38军调一个师到南口，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主席对林彪一伙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下午3点多钟谈话结束，我们离开毛主席的专列，我与纪登奎同志立即赶到北京军区同陈先瑞政委等领导同志研究部署了38

军一个师的调动。

毛主席料事如神，似乎什么事情都跑脱不了他的预料，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大事。

## “九·一三”事件

9月12日晚，我从北京军区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会上，我的紧张和忧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脑子里一直在转着毛主席下午接见时的谈话。我想，同林彪的斗争还没有完，而林彪现在并没有认错的迹象，这场斗争的前景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是向好的方面转化，还是继续向坏的方面转化？

会议进行到晚上10点多钟，突然，工作人员把周总理请出去了。周总理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讨论停了下来。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

这时，发生了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惊心动魄，震惊中外的一幕——“九·一三”事件。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再次打乱了林彪集团的反革命部署，搞得他们措手不及，乱了阵脚。

后来我们在审林彪叛逃的经过时，查清的事实是这样的：林立果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对着他们的同伙连声叫喊：这下完了！这下完了！惊呼沿京沪线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彻底破产了。他当即打电话告诉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说情况变了，要改变计划了；同时要求周宇驰他们实施《“517工程”纪要》的第二套方案，立即研究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和人员名单。经过紧张密商之后，林立果乘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

当晚，在北戴河，林彪、叶群、林立果以给林立衡与未婚夫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作掩护，紧张地进行南逃的准备活动。在北京，先是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制定南逃广州的方案。在这之后，由王飞和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等人，在空军司令部大楼开会，具体策划南逃乘坐的飞机、人员编组，携带武器装备。

他们南逃准备了5架飞机，计划在9月13日早晨8时，林彪、叶群从山海关机场坐258三叉戟飞机，直飞广州，13日7时由另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机关的人，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广州。另外，还准备了1架伊尔18、1架安24、1架安12飞机，同是飞往广州。

晚上11时，叶群还打电话给西效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空34师师长胡萍，检查飞机准备的情况。在这之前，吴法宪

对胡萍交代，要把大飞机都准备好，随时调去广州。

在这危急时刻，平时与叶群不和的林立衡，向 8341 部队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队长姜作寿，报告揭发了林彪、叶群准备逃跑的阴谋。

这时，就出现了我前面提到的情形。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会议的周总理，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电话间接电话，接到北戴河传来林彪准备南逃的报告。

周总理沉着冷静地处理这件大事，他要求张宏进一步核准情况，同时找吴法宪追查 256 号三叉机的情况，问吴法宪知不知道有一架飞机去山海关机场了。吴法宪当时没有正面回答，说要查一查空军调度室。后来周总理通过北戴河的张宏，查实了下午确有一架专机从北京飞来山海关机场。

周总理立即想到山海关机场属海军管。他马上又找李作鹏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情况，李作鹏同样回答说，要查一查。

这时，周总理下达了“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 4 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的指示。后来李作鹏篡改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他也不布置山海关机场采取阻止飞机强行起飞的措施。

晚上 11 时半左右，周总理直接打电话给叶群，查问山海关机场那架专机的事。

周总理问叶群知不知道北戴河有一架专机。

一开始叶群撒谎，说她不知道。后来叶群又说：有，是我儿子坐过来的，林副主席说，如果明天天气好，想到天上

转一下。

叶群的答话，更加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

周总理又问叶群：是不是还准备到别的地方去？

叶群说：原来想到大连去。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说：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如果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同志。

叶群一听周总理要去北戴河，更慌了。她怕周总理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破产。叶群再三劝周总理不要去北戴河。

周总理与叶群通完电话之后，立即派我到空军作战室，派杨德中同志陪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同时，要求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三叉机，连夜返回北京。

这时，在西郊机场的空军副参谋长兼34师师长胡萍，得知周总理追查256号三叉机的事，感到林彪南逃的阴谋已被中央察觉，一边打电话给在山海关的空军34师副政委潘景寅（专机驾驶员），让他借口飞机有故障，不能飞回北京；一边要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林立果，事情已经败露，要他早打主意。

林彪得知这些情报后说：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赶快准备东西，马上就走。叶群更加惊慌失措地叫喊：快！越快越好！

林彪按照他自己设想的发动反革命政变计策，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下策是北飞出逃国外。现在上、中策都破产了，只

剩下下策一条了。林彪、叶群、林立果立即坐上防弹红旗车，以每小时 100 公里以上的速度，到了山海关机场。

根据当时山海关机场工作人员赵雅辉、佟玉春、王学高、周振山、刘三儿目击林彪、叶群等仓皇逃命的狼狈情形：1971 年 9 月 13 日零时 22 分，林彪一伙乘坐红旗车，以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子还未停稳，林彪一伙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舷梯的情况下，这伙叛徒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叶群脚。他们没有等机组人员上齐，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信报务员都没有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有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仓促启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破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于零时 32 分，强行起飞，仓皇逃命。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 256 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经过了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周总理要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用无线电向 256 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

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 256 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调度员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掉转方向往北飞。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

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我问他：“有什么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板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么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

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因为梁璞他们并不知道飞机上坐的什么人，所以他们又一次焦急地问我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

就这样，我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月13日凌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线。

从这以后，总理反复让我们查清256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我们根据查实的数据计算后，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并将情况和看法，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报告。

空军作战部和司令部办公室，是林立果小舰队控制的地方。就在这个楼上，还刚刚开过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当时我只带了一个警卫参谋坐镇空军作战值班室。小舰队的成员，一听说我到了那里，立即四处溜散，开始王飞还露过一次面，后来也走了，可见他们的阴谋活动是见不得人的。

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么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当即，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下达命令，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实行全国禁空。同时，通知政治局成员都到人民大会堂，以便有重要情况及时讨论。

南京军区按照命令作了部署后，许世友同志立即把电话打到空军作战值班室，对我说：“李德生同志，你一定要好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周总理指示：“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绝不能让它飞走！”

我叫梁璞问沙河机场：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飞机起飞了。”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空军政委王辉球、副司令员曹里怀等领导人，他们既不知所以，也不知所措，一个个神色紧张地站在那里。我也不便于向他们解释。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飞机呼叫返航，直升飞机不听不理。

我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起飞8架歼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

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6飞机和直升飞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8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向歼6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向目标开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飞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事后得知，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正在这时，歼6飞机开

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境内迫降。

丧心病狂的周宇驰竟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修文壮烈牺牲。周、于两犯开枪自杀。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他后来供出了驾机外逃的经过。

林彪的飞机到底飞到哪里去了？我们仍然在焦急地等待结果。

周总理已经 50 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林彪出了事，必须以最快速度通报各地党政军领导，方能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变。周总理亲自向各大军区，29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打电话通报情况，讲得既清楚又含蓄。

“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经常生病的那个人，出问题了，听懂了没有？”直到对方答：“懂了”，他才放了心。

他还要随时将各方面情况报告毛主席。

待一切安排妥当，已经到了 9 月 14 日中午。下午 2 点，周总理刚睡着，外交部送来我驻蒙使馆电报，秘书只好把他叫醒。周总理叫秘书念电报，当他听到 256 号三叉戟飞机，于 13 日凌晨 2 时 30 分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 8 男 1 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得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他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9 月 15 日，经过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到实地察看，报回来 256 三叉机坠毁的残骸和林彪、叶群等 9 具被烧死的

尸体的照片，完全证实林彪叛党叛国，折戟沉沙，葬身于温都尔汗。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同政治局的成员，举杯庆贺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清除了我们党、我们军队、我国人民的一大祸害。在“八一”前夕，还为林彪拍照的江青，这时也流出了演员式的眼泪，装模作样地和大家频频举杯。后来才明白，林彪一死，她在“文革”中同林彪勾结的事情，就死无对证了。黄、吴、李、邱则强作笑脸，极不自然。周总理当着他们的面，非常严肃地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当场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 清查林彪罪行

林彪乘机叛逃前，从中央来讲，当时只是掌握他在庐山会议所犯的错误，也知道他一直不作检查的对抗态度，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察觉到某些不正常情况，更加引起警觉。现在居然叛变外逃，性质起了变化。但是，仍然没有多少确凿证据，可以说明他搞阴谋活动的全部内幕和详情，也弄不清卷进这一事件的还有些什么人，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迅速查清真相，坚决防止林彪余党可能制造的事端，这在当时，是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和严密措施加以解决的。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周密部署下，不到10天，就查清了林彪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基本情况，掌握了确凿的证据。

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采取了下达禁飞命令，派陆军进驻机场警备，以及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同时，迅速组织力量在山海关，扣押了没有来得及登机叛逃的人员。在13日迫降直升飞机后，根据缴获的文件和李伟信的交代，立即通知广州军区，抓获了由北京乘火车到广州，为林彪另立中央打前站的；10几个“小舰队”成员，他们没有出火车站，就被扣留了。在北京，查封了林立果几个秘密据点，对江腾蛟、王飞等人采取监护措施。在北京、广州、上海，拘留了林立果等秘密组织的“战斗小分队”的骨干。短短一两天内，将这些正在积极从事反革命政变活动的骨干分子，一网打尽，林彪的“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迅速瘫痪，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北京和外地收审的人员先后集中在西郊亚非疗养院内。开始，他们并不老实交代问题，有的抵赖，有的避重就轻，有的装疯卖傻，有的甚至要誓死忠于林副主席。直至告诉他们林彪已经叛逃摔死，一个个才像瘪了气的皮球，那种一再鼓吹的“江田岛精神”（即法西斯武士道精神）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有一个详尽的计划，有一支大小“舰队”为骨干力量，有一个周密准备的过程。然而，毛主席、周总理机智果断地粉碎了他们的计划。林彪一伙一旦阴谋败露，只带了叶群、林立果等几个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他的死党和骨干，也土崩瓦解。这充分显示了我们党是伟大的，我们军队是可靠的，我们政权是巩固的。任何反动势力要想兴风作浪，总是不得人心，都逃脱不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罗地网。

对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清查，进展非常迅速。

首先是直升飞机迫降后，从这架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其中有林彪的反革命手令，大批机密文件和美金等等。林彪用红铅笔写的手令是：“按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直升飞机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两个反革命手令撕成几十块碎片，当部队、民兵在现场搜集上缴后，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和我们几人一起辨认，他亲自仔细拼对，确认是林彪亲笔所写。这就证据确凿地证明，这场反革命事件的头子是林彪。

与此同时，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投案揭发交代，也起了重要作用。

到9月14日中午，我已经整整两天两复没有合眼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利用中午时间，把我安排到京西宾馆休息一下。我刚躺下，军委1号台总机传来电话说：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有急事找我。当时我想，我在空军作战值班室坐镇近40小时，始终没有见到作战部长，怎么现在出现了呢？我让秘书与他联系，他说要投案揭发重大问题。我顾不上两天两夜没有睡觉，马上叫他来见。鲁珉一见到我，放声哭着说：“首长，我犯了滔天大罪，犯了杀头之罪，我参与了阴谋杀害毛主席，全国人民都不会饶恕我的。”他那双红肿而几乎睁不开的眼睛，不断地流着眼泪。我听了很吃惊，原来只认为林彪要阴谋篡党夺权，竟然还要谋害毛主席。

对鲁珉这个人，我过去了解一点，他是抗美援朝期间，

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英雄。我叫他冷静下来，慢慢地说。鲁珉详细揭发交代了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策划谋害毛主席的经过。按照他们的预谋，林立果、周宇驰一伙，企图趁毛主席南巡的机会，在上海地区首先让空4军原政委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时，下手行刺；此计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40火箭筒、100高炮平射，打毛主席的专列；这还不行，就在苏州硕放桥用炸药炸专列；实在还不行，就用轰炸机炸专列，派鲁珉去南方执行轰炸任务。毛主席提前回京的行动，使这些阴谋一个个被挫败，9月12日晚，又要鲁珉参加制定第二天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行动方案。当时鲁珉害怕干不成，林彪饶不了他；干成了，林彪会杀人灭口，将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转嫁给他。鲁珉以回家作一点准备为借口，和他当医生的妻子商量后，用盐水擦坏了眼睛，当晚看“急诊”躲进了空军总医院。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所说的：林彪搞政变，有的是想干不敢干，有的是叫干不愿干。鲁珉就是叫于不愿干的其中一个。

鲁珉当时还揭发交代了林彪一伙其它方面的罪行。他谈完之后，我让他在揭发交代记录上签上名，立即将这一重大揭发交代材料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看了很快给我来电话说：鲁珉的揭发交代很重要，一是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尽管控制很严，但并不是铁板一块；二是说明林彪是一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极其凶残的反革命两面派。鲁珉的交代是对清查林彪反革命罪行的一个重大突破。后来把鲁珉收审到亚非疗养院时，单独给他安排了一间房子，不派专人看管，允许他可以与妻子孩子同住，允许他可以自由活动，体现坦白从

宽，区别对待的政策。

还有一个重要材料，即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查获，使清查工作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9月14日，为了迅速查清与林彪反革命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按照中央的指示，总政机关投入了大部分力量，分别派到一些重点单位指导和掌握清查工作，派到亚非疗养院审查抓获归案的人员，派到林立果一伙的秘密据点搜查罪行材料。其中，一个工作组专门去了空军学院。工作组去的时候，我到空军学院作过一次动员，要求大家把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事情彻底揭发出来。大约是十七、八日，林立果秘密据点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有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代，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代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这是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立即。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是一项非常紧张繁重、艰

巨复杂的任务。首先是林彪为了实现他的反革命野心，拉帮结伙，结党营私，罗织了以“大、小舰队”为主体的反革命集团，通过他们的所谓“路线交底”和“效忠活动”，形成了相当大的势力。其次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涉及到不少高层领导、要害部门和他们控制很严的单位，而且又集中在军队。再就是当时为了保密，林彪叛逃案件，第一步只是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人，清查工作还不能公开地、全面地展开。

为了及时掌握清查工作的第一手情况，在收审江腾蛟、王飞等不少重点对象时，我都直接谈话，交代政策，查询案情。林彪的原秘书、陆军 127 师原政委关光烈，曾参与林彪发动武装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九·一三”事件后，军的领导要他交代问题，他说：我的问题和你们说不清楚，要说到北京去说。关光烈被押送到北京后，我亲自与他谈话，讲明政策，他基本上老实交代了犯罪经过和事实。

为了掌握了解黄、吴、李、邱的动向，周总理让我与他们接触一下。当时有人提出去他们那里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我想这是周总理交办的有关清查的大事，危险再大也要去办。我大概于 8 月 19 日，到黄、吴、李、邱住处，分别与他们作了接触，四人的态度各有不同，都笼统说要认真作检查，但没有一个说自己究竟有哪些错误和罪行。事后我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使他及时了解黄、吴、李、邱的态度和动向。

空军机关是林彪严密控制的单位，是受林彪破坏的“重灾区”，也是清查的重点单位。我找空军党委几个常委谈话时，与吴法宪直接进行了交锋。当时查出九届二中全会前夕，

吴法宪为了配合林彪在庐山向党发动进攻，让林立果在空军“三代会”上作所谓“讲用报告”，狂热吹捧是“放了一个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而且还查到1970年8月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作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为了使清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中共中央于9月18日正式发出通知，向全国各地和军队主要领导人，通报了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经过和事实真相，通知指出：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在这期间，中央向在党政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通报了林彪事件，激起了老师、副总理和老将军极大的义愤，陈毅同志带病参加座谈会，同聂荣臻、肖克等许多老革命家在会上揭发了林彪历史上的错误，批判他叛党叛国的罪行，朱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邓子恢、肖克、曾山等同志还写了书面揭发批判材料。

在全国各地纷纷揭发林彪罪行的同时，黄、吴、李、邱在周总理宣布他们集中精力检查交代问题的10天之内，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反而大量销毁罪证

材料。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让我协助他，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采取了严密措施，于9月24日上午，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宣布实行隔离审查；邱会作是在当天上午去首都机场送李先念副总理出访返回后，被隔离审查的。当天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委各总部、军兵种等单位领导人会议，宣布了党中央、毛主席对黄、吴、李、邱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当时，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清查是严格的、严密的、严肃的；对于陷入林彪反革命集团，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人，既严肃查清问题，又严格掌握政策。毛主席曾指出，跟着林彪搞阴谋活动的死党不会超过100人，他是副统帅嘛！有些人是跟着犯了错误的。那时，为了迅速查清林彪一伙罪行，曾把林彪、黄吴李邱等人的秘书、警卫等工作人员，集中起来办学习班，揭发交代问题。毛主席也说过，这些秘书，是党派他们去工作的，林彪搞阴谋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知情，要区别对待。后来毛主席还说：林彪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当人们知道他要做坏事，是不会跟着他干的，他一切不能调动，一切也指挥不动。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在学习班土：传达后，他们很受感动，都纷纷作了揭发交代。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林彪一伙身边工作的人员中，除极个别的外，对于林彪一伙阴谋活动，并未参与。他们划清界限后，揭发出的许多现象，许多蛛丝马迹，以于弄清林彪一伙罪行，还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彻底揭发、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中央先后在9月28日发出扩大传达林彪叛逃事件的通知；29日发出

对黄、吴、李、邱实行隔离审查的通知；10月3日发出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同志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同日又发出中央成立彻底审查林彪罪行专案组的通知。我是军委办公会议和专案组的成员。10月24日决定，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11月14日又公布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全国各地一致拥护党中央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采取的各项措施，就在一些被林彪及其死党控制很严的单位，广大群众了解了事实真相，也同样投入了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热潮。全国人民全面了解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后，积极拥护和参加批林整风运动。

## “九·一三事件”的处理经过

近些年来，关于林彪叛逃的文章，在海内外报刊上多有登载，已使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昭之于世。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心潮起伏，我的思绪总是萦绕于16年前9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自建国后我睡眠最少的时候，也是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笔者由于工作的关系，对“机毁人亡”后的情况可谓略知一二，谨记述如下，或可有助于补阙。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工作一如往常，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13日上午，曾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书记、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不像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化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做了四种

估计：

-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 12 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直奔向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 8 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坠毁在蒙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 9 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他分管对蒙外交。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

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有一架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当时，我是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总理的指示分三点：

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 18 份，下午 6 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

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

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我站起来准备马上去落实总理的指示时，韩念龙同志又匆匆进来，我知道鹏飞同志约他来是商量起草给我蒙古使馆的指示。给驻蒙古使馆的指示于下午3点30分发出。

我把办公厅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同志找来，和他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王××专门译办来往电报，并要王立即搬到离我办公室较近的房间工作。

下午5点58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良恩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候。我们来不及寒暄，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象已等了一会”。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大笑：“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题：“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副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然壁上新换一副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乔公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

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我们都太兴奋了，这两天也都太紧张了，本应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幅字，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幅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公听后，沉思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公：“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如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乔公刚把“改诗”用铅笔誊出，电话铃声响了，是部值班室来的，又接到使馆报告了。我急忙告辞准备直接去办公室，临出门时，乔公说：“本应把半瓶茅台给你带去，不过你今晚就要酩酊大醉了。我这里有包速溶咖啡，给你带上，你会发现他的妙用”。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4人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视察。

9月16日晚11时30分，我批发了一份文件催问视察情况和现场停留一天的原因。

9月17日晚8时半，使馆报告，大使等4人已于晚7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有关材料回来，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接使馆报告，决定派孙一先二等秘书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9月19日晚使馆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已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下车我们就迎了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招呼后，就东张西望。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是专程来接他们的，正在找来接站的人。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随后又告诉贺喜同志，他可以回家住，关于我国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进到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里，把文件交给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

洗。然后，我对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绝对保密。并向他交待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再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他联系。

晚上，11时许，我和鹏飞、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研究有关的问题。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说贺喜已回家，便面色一沉，那双著名的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对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的经历是十分了解的，他当然知道我曾在部队里工作过。记得我第一次单独见总理，是在1950年的7月，我被任命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因为是新建馆，临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听完总理的指示起身告别时，总理半天玩笑地指着我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时此刻，问我这个问题分明是批评我的警惕性跑到那里去了。他严肃地审视着我，好像真的等我回答是否当过兵。我立即回答说：“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待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

招待所住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注意事项。这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每逢我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对我在工作中的教诲和批评时，这件事的印象总是那么深刻，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说来奇怪，在我遇到困难，在感到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时，耳边常想起总理用十分严厉的语调问我：“我当过兵吗？”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眼手表，已是22日凌晨2时多。服务员送来了晚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唯独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按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接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又对我说：“你也参加”。

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部长李震、北空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大家就分析，讨论了起来，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李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来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

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带去。

早晨4点多，德中同志又回去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9月24日上午，我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看到成群的学生仍在为庆祝“十一”排练队列，一切照旧。按照总理的指示，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当车子从东单向北拐去时，我听到有广播车的声音，忙问司机同志：“在干什么？”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把车子靠在马路旁停下，并摇落车窗，声音十分清楚响亮：“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对他说：“我们走吧。”

9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提问。总理终

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到：“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他一个人。

27日一早，在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告诉我，经请示总理同意，已允许在招待所住的那二位同志和家里取得联系。

9月29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镇大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我带来的信息，非常兴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提高嗓子对我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回到房间里，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他告诉我，这瓶酒他已珍藏多年，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個屋子里扩散，我发现这酒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

这是我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